明代研究 第二十二期
2014年6月，頁1-49

地志與紀遊：
《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

馬孟晶**

明代後期各地名勝志之編纂蓬勃發展，杭州西湖地區尤為突出。本文主要聚焦成書於崇禎間（1628-1644）的《西湖合志》，該書是由《西湖志》、《東西天目山志》、以及《徑山志》所彙集而成的總合名勝志，結構上是以西湖為中心，加入鄰近名山，在較晚的刊本中更進一步匯入天下名山，在明代名勝志書中體例特殊。

本研究追索西湖相關的系列山水志書，發現其刊印頻繁，不斷重編再版。編纂刊印的動機，從保存文史、可作治事參考、視為個人政績、或護持佛教寺院，逐漸轉變為收錄更多個人性的社交旅遊活動和題詠詩文，讓無法親臨其境的讀者藉以臥遊名山大川，立意已與「近乎郡史」的早期西湖志書相去甚遠，心態上則重視遊賞遠勝於紀實，將公眾性勝景的客觀紀錄轉化為私人性集體記憶。因杭州之各種地志需求量大，吸引眾多文士投入編纂，相互援引和撰述者專業化的情況特別突出，志書之編撰及出版也成為文人交遊的另類空間。《西湖合志》的出現，不但見證西湖旅遊活動之繁盛，也與城市生活的社交性息息相關，此當肇因於西湖與杭州緊鄰相繫的獨特地理位置。

關鍵詞：西湖　名勝志　杭州　出版文化　旅遊文化

* 感謝相關版本收藏圖書館惠予提供閱覽上的協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和邱澎生教授提供的修改建議。本文為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100-2410-H-007-038-MY3）的部分成果，移地研究的經費亦得到國立清華大學人社中心之補助。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

萬曆三十五年（1607）冬，邢台人傅梅（1565-1642）就任登封知縣，「甫入境，見二室插漢，不覺躍然，喜曰：『此古所謂中嶽嵩高也。』」他感嘆：「嵩故無書，古今一切禮樂名物委諸草莽，掌故之謂何？蓋亦有司失職所致也。梅竊有志焉。」[1]傅梅上任後，大力整頓庶政，待四方綏靖後，更致力於整理文獻。友人王履和歷數其政績：「先生居嵩五載，始至治盜，二年救荒，三年城堵，百廢修舉，四民順化，嵩人社而稷之，……則嵩之有書也，先生之精神為之也。」[2]傅梅所纂之《嵩書》（1612初刊）是嵩山首部完整的專志。對於晚明的地方官員而言，到任時披覽既有地方志以瞭解一地事務，進而修纂方志或補充其中訊息已很普遍，[3]在傅梅筆下，位居嵩山南麓的登封既只是彈丸之地，轉而為列居五嶽、「其地甚古，為中州山川之最，名蹟勝槩，志不勝書」的嵩山作志，[4]或不令人意外。除了提醒吾人，名勝志的修纂與刊刻常與地方官員關係密切之外，亦可說是明代後期各地湧現修志風潮中的典型代表。

地方志書的修纂雖由來已久，在中央政府鼓勵、地方經濟與社會條件也成熟的情況下，明代修纂方志的風氣大興，並於嘉靖到萬曆年間（1522-1620）進入鼎盛階段，[5]除了地方政府將方志視為轄區歷史發展與各種資訊的重要記錄外，許多名山寺觀和書院等機構也在此時編纂並刊刻了第一本專志。[6]為名山修志可以上溯到唐代，[7]或出於深恐「名山無志，後將湮沒失傳矣」的史家

---

1 〔明〕傅梅，《嵩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嵩書》自序〉，頁6-7。傅梅《嵩書》有1612年初印本與天啟遞補本，版本說明請參見〔明〕傅梅撰，向東、關林點校，《嵩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前言〉，頁6-7。

2 〔明〕王履和，〈《嵩書》後序〉，收入〔明〕傅梅，《嵩書》（上海古籍版），頁426-427。

3 如葉春及到福建惠安任知縣時的例子。見 Timothy 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5), 43-58.

4 〔明〕傅梅，《嵩書》（上海古籍版），卷22，〈《嵩吟》自序〉，頁419。

5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32-40。

6 Timothy 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43-44.

7 〔唐〕李沖昭所撰之《南嶽小錄》可能為最早的山志。見〔清〕永瑢等撰，《四

用心，[8]但因遊覽名山大川已成風潮，亦可視之為旅遊書籍的一種，與程圖路引、遊記文集等並列，和晚明旅遊文化的蓬勃發展緊密相關。[9]

這些旅遊書寫的文本彼此雖有重疊之處，但也各具特色，適應不同旅遊者的需求。路程書一般著重於水陸交通路線的資訊，實用性強；遊記文集則從作者個人遊歷的主觀認知出發，體裁多變而內容分散，撰寫之主要目的並非提供規劃旅遊活動之實際參考，但常提供更深刻且個人性的旅遊經驗分享。相較於這兩類與旅遊活動直接相關的書籍，以特定地理區域為範圍、著重景點記述的名勝志，雖未必標榜為旅遊之用，由於能提供系統性的知識，往往也是熱衷旅遊者必備的讀物。袁中道（1570-1623）就曾說，遊覽山水時「山志宜攜，恐有遺也，皆遊具也。」[10]

明代刊刻的志書數量龐大，是從事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各地收藏的方志、山水志、佛寺志等文本也不斷被整理、收錄於叢刊中影印出版，但或許也因內容雜蕪、體例不一，針對志書文獻本身的研究卻相對較少。除了著錄和通史式的撰述，以及零星的個別考證之外，直到近年方有根據傳世明代方志與寺志進行較為廣泛且深入的分析，討論其性質、體例、參與撰修者、刊刻過程與流傳方式等議題。[11]另一方面，旅遊文化也是近年頗受矚目的新興研究領域，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12]但現有論著多集中於探究旅遊活動的進行與評價。旅遊書籍雖被認可是重要的一環，其中路程書和遊記文學亦已

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頁 279-280。

[8] 〔清〕釋際界，〈跋〉，收入〔明〕釋廣賓纂輯，〔清〕釋際界增訂，《西天目祖山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頁 653-654。引文為餘杭士人章尹之語。

[9] 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頁 20-22。

[10]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5，〈太和後記〉，頁 493。

[11] 如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Joseph Raymond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Histories in Mi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4).

[12] 巫仁恕的系列深入研究可為其中代表，如〈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頁 87-143；〈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 225-255。

有不少學者投入研究，[13]但名勝志到目前為止尚未引起太多學者關注，而旅遊書籍在旅遊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還有可開拓的空間。

卜正民（Timothy Brook）可說是較早注意到這批專志和旅遊書籍之價值的學者。他登錄、整理了存世的明清路程書，以及各地之非行政機構的專志，包括山水、寺觀、書院、祠廟等題材，在簡短的導言中已提出頗具洞見的觀察。[14]地方志書是他探究晚明士紳與佛教關係的重要材料，在稍後論述明代的社會與文化時也不斷被突顯，可以是士紳參與寺院事務的管道、[15]取得旅遊資訊的憑藉、[16]或地方官員瞭解治理地區和留下政績最好的方式。[17]不過他雖觸及旅遊文化的面向，卻著墨不多，也較少對編纂個別志書的時空脈絡深入剖析，並無出版文化面向的關懷。[18]亦即志書在他筆下仍較偏於作為保存和傳播文化與知識的載體，而非研究之主體。

此外，迄今關於志書的研究以觀察整體性趨勢居多，除了透過數量統計來討論區域分布之外，鮮有深入探析志書生產流通與特定地域文化的關係，而這也是值得開發的面向。就數量而言，前文所引之《嵩書》出自河南，該地出版的方志雖不算少，仍要讓浙江地區一籌。[19]杭州府境內山水與祠寺等機構的專志，出版比例亦居全國之首。[20]在杭州的出版品中，「反映本地豐富歷史積澱和秀麗自然風光的題材」可謂最具特色者，[21]而在作為代表性文本

[13]路程書之研究如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遊記文學之研究有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14]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2nd edi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31-41.

[15]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6-181.

[16]Timothy Brook,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79-182.

[17]Timothy 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43-58.

[18]卜正民雖曾討論葉春及改變方志體例之《惠安政書》的出版歷程，但較偏重於地圖繪製部分。見 Timothy 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43-58.

[19]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75-76。

[20]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32.

[21]祈晨越，〈明代杭州的書籍刊刻活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0），頁 53-72。

的名勝志中，西湖無疑是最突出的主題。筆者近年專注研究杭州地區刊刻之旅遊文本與圖像，先從影響最深遠的《西湖遊覽志》著手，查考其刊刻與改寫的歷程，也嘗試將之置於出版文化和旅遊文化的雙重脈絡中來剖析，再定格於杭州此一旅遊書籍出版的地域，連結到城市文化的特性。[22]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了一部既延續此傳統，又是變格的文本——《西湖合志》。該書成書於崇禎年間，是由《西湖志》、《東西天目山志》、以及《徑山志》所彙集而成的總合名勝志，在較晚的刊本中並進一步匯入天下名山，從結構上來說是以西湖為中心向外輻射，加入鄰近重要名山，再擴展到天下名山，體例相當特殊。或許因流傳不廣，存世刊本極少，又看似取自既有志書刪削重刊而成，除了出現於藏有該文本的圖書館目錄中，絕少被提及或關注。[23]

細究其內容，該書所收各種志書雖皆根據既有版本重編而來，但原有諸書大致皆在嘉靖到天啟年間（1522-1627）初次刊印，甚至在崇禎之前便已迭經出版，若視為發展序列，則會觸及諸多關於名勝志之纂輯出版的重要議題：從立意上看，為何會有重輯與擴編《西湖合志》的構想，而統整的編輯原則又反映出對山水志書的何種想像，便相當引人好奇。若從刊印者的角度來看，作為核心作品的《西湖志》是從《西湖遊覽志》演變而來，初期雖屬官員助印，性質也被認可為官署刻本，但由於具有商業價值，萬曆後期到崇禎年間已經出現眾多商業書坊改編的新版本；[24]相較之下，《西湖合志》系列中的山水志則絕大部分是由地方官員及相關人士主持修纂與刊刻，並無意於營利，而且官刻性質濃厚。商業書坊與官員主導的志書有何相異的考量，如何能夠彼此相融，運作上又是否有相通之處，也值得探究。由志書本身的性質來看，徑山及西天目山皆以當地歷史悠久的佛教古剎著稱，以山為主題的志

[22]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4（2013），頁 93-138。

[23] 在兩部集列方志及其版本的目錄書中，洪煥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未收此書；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在 1636 年刊《徑山志》項下標註「與《東天目山志》、《西天目山志》合刻為《西湖合志》」，但卻遺漏了組成中最重要的《西湖志》，見頁 170。

[24]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頁 108-127。

書往往包含甚多寺院活動的記載，有的版本已等同於寺志。山志與寺志的關係和各自重點的取捨所在，也是理解明代方志的一個重要面向。從功能的角度觀之，山水志既以描摹名勝古蹟為核心，與郡邑方志或應有所區隔，如前文所言，常成為遊歷名山大川的導引。山水志的興盛顯然與晚明蓬勃的旅遊風氣相關，但旅遊文化究竟是如何具體影響山水志的編纂和收錄的內容？參與纂修者如何看待此事？

循著以上的關懷，本文主要以編纂於明末的《西湖合志》為中心，追溯其成書的過程和版本的演進，分析其性質與內容，並分別探討其所收錄之各種志書的沿革，以及主事和參與者的用心所在。馬德偉（Marcus Bingenheimer）曾敏銳指出方志研究的困難，除了數量龐大之外，亦在於版本沿革問題的複雜。[25]但從版本沿革的角度著手，恰可見微知著，深入理解志書的生成與演變，也可對一地之文化發展作更具歷史縱深的觀察。本研究即希冀以《西湖合志》這部經過較長時間發展、內涵也相對複雜的系列志書作為個案進行研究，試圖回應上述的議題。

一、《西湖合志》的成書過程與版本

《西湖合志》系列是由《西湖志》、《東西天目山志》及《徑山志》共同組成。此種山水合志看似乖違體例，實則事出有因：

> 杭州山脈，發自天目，然天目有東、有西。東天目之脈，萃于餘杭，結局於徑山。西天目之脈，萃于錢塘，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26]

田汝成（1503-1557）在《西湖遊覽志餘》裡的這段話，清楚交代了西湖與周遭諸名山的關係，也就能解釋《西湖合志》系列從《西湖志》出發，復綰連《東

[25] 馬德偉（Marcus Bingenheimer），〈中國佛寺志初探及書目研究〉，收入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漢語佛學評論》，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78。

[26]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卷 21，〈委巷叢談〉，頁 558。

西天目山志》及《徑山志》的緣由。其中《西湖志》正是從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改編而來。《西湖遊覽志》與同時成書的《西湖遊覽志餘》不但是這幾部名勝志的出發點，也是成書最早者。身為錢塘人的田汝成在歷官廣東、貴州、福建等地後返鄉，因感「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遂編纂古往今來的西湖文獻與掌故軼聞，「敘列山川，附以勝跡」，紀錄西湖畔與杭州城的景點和歷史。[27]此書寫成後，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杭州知府嚴寬（1493-？）的支持下終得以付印出版，後來在萬曆年間又有三次改版：前兩次是由地方官員所刻印，更動幅度不大；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則由會稽人商維濬設在杭州的書坊大幅增補內容，以反映地理景觀及人事的新變化，並重新排版雕印，成為流傳最廣的版本。此種由商業書坊出版的名勝志實屬罕見，由翻印的後刻本及今日存世的數量之眾，都可看出該書應相當具有市場價值。《西湖遊覽志》是在為名山大川作志之風潮中誕生的產物，內容雖然豐富，對於後續志書和文學的影響亦十分深遠，但畢竟卷帙浩繁，閱讀或攜帶都不容易，所以從萬曆後期到崇禎年間出現了刪減內容、重新分類、縮小尺寸等不同取向的改編本，而這些版本的共同之處，是都帶有商業性的考量。從以上的情況，我們知道在田汝成撰成《西湖遊覽志》之後，晚明同時有官員主事、書坊改版、以及刪削簡化的多種版本持續問世，而且都是在杭州刻印，相關的文本在杭州必定廣為流傳。[28]

或許正因如此，萬曆晚期之後，當新到任的地方官員欲如登封縣的傅梅般整理當地名勝的文獻時，已很難只以西湖作為主題，於是便把觸角伸向鄰近的名山，甚至進一步將之彙集出版。由於《西湖遊覽志》原本即是以三山一湖為全書架構，溯及山脈所由來的天目山也很合理，故《西湖合志》實可視為西湖名勝志發展到明末的總合性新方向。今日流傳於世的《西湖合志》主要有《增輯西湖合志》與《廣西湖名山合志》這兩個先後刊印的版本，[29]分

[27]〔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西湖遊覽志敘〉，頁 5。

[28]關於《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和後續的商業性改編本，見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頁 93-138。

[29]二書均無扉頁，且內文提及之書名紛雜不一，然根據各卷卷首的統一題名，分別稱之為《增輯西湖合志》與《廣西湖名山合志》。

別收藏於東京的國立公文書館，以及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兩者內容皆包括《西湖遊覽志》中已涵括的西湖、吳山與浙江（即錢塘江），再加入東西天目山和徑山，但《廣西湖名山合志》在《增輯西湖合志》的基礎之上，再擴充到兼容天下名山，架構亦隨之大幅修改。重疊部分的內容相似度很高，只是在序文和評註等附加資料上出入較多，因此後者應可視為前書的延伸（本文中系列西湖志書版本沿革之簡圖請參考附表一）。二書所附加的序文、凡例等說明性資料頗多，我們亦可據以重建刊刻的過程與考量。

成書較早的《增輯西湖合志》包括各自獨立的《西湖志》、《東天目山志》、《西天目山志》、和《徑山志》。[30]在《西湖志》前附有四篇針對《西湖合志》所作的序文及凡例，[31]四篇序文之末的紀年橫跨崇禎三年到十三年（1630-1640）之間，由此可知該本應是在1640年左右刊刻。

根據序文的內容，全書的主事與編纂者應為來自蒲坂的李紹賢與杭州當地的章之采。關於兩人的因緣，石萬程序文（崇禎十年，1637，時任杭州知府）有言：「蒲坂印渚李公（即李紹賢）嘗從若翁水部先生奉使兩浙，聲氣相招，與偕名輩，讀書湖上。」[32]李紹賢在崇禎三年所寫的序文中，更明確指出居杭的時間：

> 歲戊巳〔己〕（崇禎元年至二年，1628-1629）間，與章友去浮（章之采字）讀書武林署中，暇則商確煙霞，搜獵志乘，會家嚴按部及瓜去，有願

[30] 本處所根據的是編號「史 194-4」的藏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另藏有一部編號「史 193-20」的藏本，只有《東天目山志》、《西天目山志》、和《徑山志》，但因其序文和內容與此本幾乎完全相同，卷首標記也是此本特色，應為《西湖合志》之殘本。若詳細比對兩種刊本，在《東天目山志》卷下頁 59 末之〈游東目〉詩，作者分別有嚴錫與張繼孟的兩種說法；《徑山志》卷 5 頁 14 之〈登凌霄峰〉詩也有錢受益或許豸所作的出入，雖無法判斷為何同一首詩卻出現不同的作者，亦無由得知付印的先後，但可知至少有兩種內容略有出入的版本問世。

[31] 後三種志書亦各有其個別的序文。除序文外，這幾種志書的卷數及頁數也均是分別計算，性質上各自獨立。存世的幾種刊本在諸山志的先後順序略有出入，也應是各自獨立的性質所致。

[32] 〔明〕石萬程，〈西湖合志序〉，收入〔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崇禎十三年[1640]刊本），頁 2b-3a。據〔清〕鄭澐修，〔清〕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62，〈職官一〉，頁 551，石萬程於崇禎九年（1636）任杭州知府。

> 未逮。昨秋去浮郵筒寄示杭守孫子長、李文若、司李陳維立次第兩目野史，文采紛披掩映。[33]

兩人曾遊歷四周名山與西湖，也讀過既有志書，因感「古今志乘，繁簡錯出，雅俗參半，汰蕪取精，更增新搆，并以一械，合則雙美」。[34]石萬程序文更具體提及此書「謀始於戊辰（崇禎元年）之春，告成於丁丑（崇禎十年）之夏」，經十年而成。但正如與李紹賢同年登科進士之姚孫棨在序文（崇禎十三年）中所指出，來自山西的李紹賢與原籍安徽的他先後來到杭州，[35]「余兩人偶先著鞭，去浮偃仰西湖，獨占片席」，外來者縱然可把臂吟哦於湖上，終究只是過客，實際擔當編撰任務者當是章之采。[36]其實李紹賢寫於1630年的序文已是「書於長安之知喜堂中」，石萬程也說此書「幾十閱年而役始竣也，而公已起家詞林、晉秩宮允矣」。[37]編輯過程中李紹賢雖不在杭州，因未曾忘記夙願，故仍與章之采書信往來，進而披閱成志，「簡去浮重修未備，并兩浙山水佳處，收拾奚囊，悉為簡點」，[38]終成此書。

---

[33]〔明〕李紹賢，〈西湖佳山水合志〉，收入〔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頁 3b-4a。同書所收〈西湖圖〉頁 1a 之李紹賢引文亦自言：「先嚴抱關於杭，得名賢章友去浮輩。」據〔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天目山志》，〈遊屐〉，頁 65a，李紹賢父李養質為「丙戌（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以水部榷關虎林（即杭州）」；李紹賢則是「壬戌（天啟二年，1622）進士，翰林侍講孝廉，時隨水部公來杭」。水部屬工部下。見〔清〕龍文彬纂，《明會要・職官四》（臺北：世界書局，1963），卷 32，頁 552。

[34]〔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西湖圖〉，頁 1a，李紹賢所撰之引文。

[35]〔清〕嵇曾筠等監修，〔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55，〈名官十〉，頁 207：「姚孫棨，舊浙江通志，桐城人，天啟間知龍游縣，……後歷浙江水利僉事道。」又據〔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天目山志》，〈遊屐〉，頁 65b，姚孫棨乃「壬戌進士，御史」，與李紹賢同科。

[36]〔明〕姚孫棨，〈名山合志序〉，收入〔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頁 1b-2b。

[37]〔明〕石萬程，〈西湖合志序〉，收入〔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頁 2b-3a。李紹賢在書成之崇禎十三年七月就任國子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因而在下文所引之凡例中亦被稱為李宮詹，十一月更拜戶部右侍郎。見黃一農，〈明末韓霖《鐸書》闕名前序小考——兼論歷史考據與人際網絡〉，《文化雜誌》，40-41（2000），頁 118，表一。

[38]〔明〕李紹賢，〈西湖佳山水合志〉，收入〔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頁 4a-b。

李紹賢在《增輯西湖合志》告成之際，便已欲再加擴編。他提及姚孫榘序文中以「直欲合兩浙、合五嶽一切名山，俛仰六合，殆無遺勝」之語，鼓勵他繼續加廣。[39]章之采亦云：「蒲坂李宮詹公（即李紹賢）屬鐫《西湖合志》，既竣，復謀盡天下名山而廣之，而合之。」[40]於是兩人繼續合作，加上姚孫榘、梁雲構（1584-1649）等人協助，輯為《廣西湖名山合志》。《廣西湖名山合志》的附加文字較《增輯西湖合志》更多，但只保留了前書中的姚序，就連李紹賢自己的序文也是新版，另外再邀請梁雲構等三人撰序。李紹賢〈廣西湖合志序〉文末云：「湖志既廣，余願亦復益廣矣。追維初意，殊不及此，梁眉公（即梁雲構）之賜可念也。崇禎辛巳（十四年，1641）歲中元蒲坂印渚李紹賢書於長安之知喜堂。」[41]《廣西湖名山合志》的主要內容可能在1641年即已初步完成。張繼的序文甚至有崇禎十二年（1639）的紀年，猶早於《增輯西湖合志》的最後一篇序文，可見兩書的編輯工作持續進行，也繼續向周遭友人求序。因嚴錫的〈讀廣西湖合志〉署為「崇禎甲申（十七年，1644）」，則此書之刻印或已在明亡前夕，甚或入清之際。

《廣西湖名山合志》無疑是《增輯西湖合志》的擴充版，但後者亦非無中生有，所收諸志最晚在天啟年間便初次有獨立的刻印本問世，部分更已迭經出版。貫串這些志書的靈魂人物應屬實際編纂的章之采。《西湖遊覽志》在萬曆末年最重要的一次改編，名義上雖由商維濬重訂，但細察卷2「湖心亭」條下有言「會稽光祿商維濬屬仁和諸生張之采增輯湖志」，可見承擔全書改編工作者應為張之采。[42]張之采接著在天啟年間也編撰了《西天目山志》和《東天目山志》。崇禎年間的兩個署名為西吳章之采編撰的《西湖合志》刊本，在內容上與這幾部志書的疊合度甚高，兩人的字又都是去浮，很可能

[39]〔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1，〈西湖圖〉，頁 1a，李紹賢所撰之引文。此篇引文中提及丁丑仲冬已獲姚年兄序言，應已是書稿完成的最後階段。

[40]〔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序刻本），〈廣西湖合志二函條例引〉，頁 1a。

[41]〔明〕李紹賢，〈廣西湖合志序〉，收入〔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冊 1，頁 4b-5a。

[42]〔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商維濬瑞蓮堂刊本），卷 2，頁 28b-29a。

為同一人。從商維濬本《西湖遊覽志》到《西湖合志》雖歷經二十年之久，但李紹賢與章之采於崇禎元年（1628）左右結識和同遊西湖，《西湖合志》的初期計畫也在此時啟動，借重其既有的豐富經驗也很自然。各卷之首雖標名為「西吳章之采」，但據寫序的梁雲構所言：「去浮之志從西湖而廣之，蓋以其家於西湖而廣之也。」則章之采也住在當地。最重要的是，《西湖合志》中有數處，章之采的署名下就鈐有「張之采印」，其人也被紀錄為仁和或虎林人。[43]《增輯西湖合志》之「章之采」條目，也標註為「仁和諸生，以修志來游」。[44]故二者很可能便是同一人。崇禎版本也許想與之前諸本的編撰者有所區隔，或為其他未知緣由而更動其姓氏，卻有太多未及修改之處留下破綻。若非出自同一人，則章之采字去浮的名字，顯然還是有從附於或借用張之采名號之意。

《西湖合志》的內容既然是在章（張）之采的編撰下逐漸統合與擴充，將前後資料合觀方能更完整地檢視其變遷，但諸種志書也有其獨立的身世，在增刪之間或可看出各自側重性質的演變。下文將繼續追溯其他山志的沿革與發展。

二、《東／西天目山志》的編撰歷程

東天目山與西天目山分別座落於臨安縣和於潛縣。根據徐嘉泰本《天目山志》的記載：

> 入於浙之西北百六十餘里，當潛臨孝豐之界，……特起二峰，屹立雲表，峙於東者為東天目，在臨安縣西五十里；峙於西者為西天目，在

[43] 如《廣西湖名山合志》冊 1 的西天目山分景圖之末有「仁和章之采」所撰的說明，底下便鈐有「張之采印」、「去浮父」二印；〔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冊 3 的〈修東天目舊志述〉末署「虎林章之采去浮父述」，鈐印包括「張之采印」。

[44] 〔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東天目山志》，〈遊屐・章之采〉，頁 38a。而在天啟元年杭州刊刻的《東天目山志》中，該條目則作「張之采」。該版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2001 年由齊魯書社影印出版。見〔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濟南：齊魯書社，2001），〈遊屐・張之采〉，頁 138。

於潛縣之北四十五里。峰頂各有一池，左右相對，故云天目。[45]

二者在志書修纂上所受到的注目有巨大的落差。東天目山直到天啟四年（1624）才初次有志書誕生，且所有刊印版本幾乎都與西天目山形影不離；而西天目山的山志不但出現更早，在《西湖合志》出現前就已經有至少四種獨立的刊本印行，包括萬曆與天啟年間的各兩個版本，彼此之間也有清楚的承繼關係。最早的《西天目山志》是由於潛令譚廷輔纂修、邑人阮子厚彙集，於萬曆十年（1582）刊行，此本今已散佚，但錢鋐和萬民紀為之所作的序文仍保存於第二個版本，也就是萬曆四十二年（1614）的徐嘉泰本中。[46]有趣的是，徐嘉泰本中也收錄一篇卓明卿所撰的〈西天目記〉，是記述他遊西天目山的遊記，文末提及受到伯載（即阮子厚）之邀而過訪，伯載示以「茲山志一編」，是該本山志在文人之間流傳、且與旅遊活動具體連結的難得紀錄。[47]

徐嘉泰本雖然也沒有刻本傳世，幸而今日在浙江圖書館中仍保存了一部舊鈔本。據〔乾隆〕《杭州府志》載，徐嘉泰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任於潛縣知縣，[48]他在任內為天目山作志的緣由，於志書本身所附、由仁和縣令喬時敏撰於萬曆四十二年的〈西天目志跋〉中有具體的說明：

> 南海徐君令於潛，慨然欲為紀述，徧訪舊志，奄暗瑣末，不足稱茲山之名勝。間謂不肖共為修輯，余簿書倥傯，殊未遑也。吾兒雲將閉讀衙齋，生平頗同山水之癖，因為蒐獵傳記，考訂沿革，山水梵剎之勝，詩歌銘賦之奇，犁焉具載。緘貽徐君，徐君爰命如椽，篇題記略，……徐君文學、政績冠冕二浙，茲集也出，即山靈與碑口同聲，共宣最績于御屏矣。[49]

---

[45] 兩峰乃介於於潛、臨安與孝豐縣界。見〔明〕徐嘉泰，《天目山志》（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卷 1，〈天目山紀略〉，頁 346。

[46] 於潛縣訓導錢鋐的〈西天目志序〉中說：「天目向未有誌，而今始採輯於阮子，編次於譚公、萬公。」（頁 438）文中提及萬曆九年（1581）已見到文稿，萬曆十年（1582）仲秋「阮生子厚持所刻誌乞余序之」，阮生並曰：「天目志成，譚侯序之，萬師序之。」則刻印時間應為萬曆十年。錢鋐之〈西天目志序〉和萬民紀之〈西天目志序〉序文皆收入〔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卷 4，頁 437-439。

[47] 〔明〕卓明卿，〈西天目記〉，收入〔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卷 4，頁 435-436。

[48] 〔乾隆〕《杭州府志》，卷 66，〈職官五〉，頁 623。

[49] 〔明〕喬時敏，〈西天目志跋〉，收入〔明〕徐嘉泰，《天目山志》，頁 341-342。

此書當主要是由喬雲將撰稿，再交付徐嘉泰編修而成。同書中亦附有喬雲將〈天目志成呈徐明府〉詩，提及「憐予三載西湖客」，[50]應是隨雲間（即松江）人的父親居杭三載時所輯。[51]喬時敏在〈西天目志跋〉文末提及，此本志書之纂輯，亦成為徐嘉泰的政績之一，恰點出歷任地方官員積極修撰志書的重要動機。

徐嘉泰本共分四卷：前兩卷搜羅歷史文獻中關於天目山的記載，歷述山水名勝、著名寺觀、及仙釋人物，也簡列當地物產；後兩卷則是古今詩文。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水〉項下所列諸條目文字雖不多，均清楚標示出相對位置，應皆是既存之勝景，雖亦偶見略述過往沿革，除與知名禪僧中峰明本相關之禮祖臺外，未見其他標注「今廢」的景點，可說是薄古而重今。但因是以類相從，將峰岩洞塢等分別標明及序列，難以據之循線遊覽，僅可說是對於當下景觀的紀錄，並無提供作為實際旅遊指南之意。將各景點分類再羅列的架構，與本文一開始提及、約莫同時刊印之《嵩書》所採取的方式相同，一年後刊成的《西湖志類鈔》（萬曆四十三年，1615，仁和人俞思冲編纂刻印）更將之作為貫穿全書的體制，並於標題中刻意強調此一特色，應該是此時流行的作法。徐嘉泰本《天目山志》後兩卷的詩文篇幅有前兩卷的兩倍之多，顯然更是關注之所在。該書雖然也收錄晉到明前的詩賦，仍以明代詩文居多，作者最近可到當代，包括參與編纂者的作品。晚明固然是旅遊文本勃興的時代，創作數量必定較多，不過選擇上仍明顯有薄古而重今的趨勢。山志中詳今而略古的趨勢，是和當時方志與佛寺志的編纂相同的發展。[52]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志書之首也附有三道敕諭，包括萬曆四十二年神宗（1563-1620，1572-1620在位）將《道大藏經》頒施予天目山萬壽宮供奉。神宗頒施《道大藏經》雖廣及在京及天下名山之宮觀，這對西天目山而言絕對也是值得標記的里程碑。不過西天目山的佛教史蹟遠勝道觀，供奉《道藏》之事

[50]〔明〕喬雲將，〈天目志成呈徐明府并序〉，收入〔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卷 3，頁 404-405。

[51]〔乾隆〕《杭州府志》，卷 78，〈名宦五〉，頁 149：「喬時敏，字古岡，上海人。庚戌進士，補仁和令。」

[52]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110-111。

雖列於書首，書中的寺觀部分卻未收入萬壽宮的條目，對於寺觀建置與仙釋人物的著墨並不如旅遊文本之多。

徐嘉泰本之所以無刊印本傳世，應是受到雕版焚燬的影響。徐文龍言：「天目一志，神物呵護之籍，灰燼於邑人之不戒。」[53]因此也就有籌備另一本天目山志的必要，這次仍是由地方官——杭州知府孫昌裔（1579-?）主其事。為此新修志書作序的商會祚認為志書須與時俱進：

> 藉令執古之志，視今之山水，山水幾不可問矣。三山孫子長公守杭，風期簡遠，政不苛而民安，教匪怒而士習，退食間，披圖攬勝，明聖兩湖與東西兩目，日暎公眉宇，陶陶樂也。湖志已更，而目志猶故，若有待以須公之一新耳。[54]

當政事上軌道後，孫昌裔方有暇遊覽四周山水，並謀為之作志。他在另一篇序文〈修天目山志序〉中說明修志的緣由：

> 治事之暇，披輿志以玄對，比於昔人臥遊，藉用為快。《西湖志》近似大備，《徑山志》載禹航，稍稍點定，東西目志尚多簡略，而西志又劫於火。天目既為錢塘祖山，龍盤鳳矯，厥維本原，探奇者嘅名乘之湮，而問守土。余無以應矣。因是次第增緝其闕遺。[55]

文末並羅列參與之編校者：「是役也，相與綜核，余同寅徐司馬公田仲、陳司理公維立；檢閱，諸學博孝廉暨諸邑弟子員；蒐獵獻公，仁和生張之采有專委焉。庚申（泰昌元年，1620）之冬至辛酉（天啟元年，1621）之季秋及期而告成。」[56]亦即是在天啟元年成書。

文中提到的西湖志「已更」或「大備」，應是指1619年刻印的商維濬刊本《西湖遊覽志》，這是在田汝成本基礎上，依照現況而大幅更新的最新版

---

[53]〔明〕徐文龍，〈三脩西天目志序〉，收入〔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啟元年[1621]刊本），頁 8b。

[54]〔明〕商會祚，〈三修西天目志序〉，收入〔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頁 1b-2a。孫昌裔於萬曆四十七年任杭州府知府。見〔乾隆〕《杭州府志》，卷 62，〈職官一〉，頁 551。

[55]〔明〕孫昌裔，〈修天目山志序〉，收入〔明〕張之采，《東西天目山志》（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109。孫昌裔雖是《三修西天目志》的催生者，他這篇序文卻是在四修版本中才出現。

[56]〔明〕孫昌裔，〈修天目山志序〉，收入〔明〕張之采，《東西天目山志》，頁 110。

西湖志。有趣的是，商維濬也參與了《三修西天目志》的編輯工作：「名家題句，下字有典，遣辭有考，志中漫以臆改。商景哲（即商維濬）悉加訂釋。」[57]而連結這兩本志書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便是實際修纂這兩本志書的張之采。同書中張京元的序文〈題三修天目山志〉不但具體說明了緣由，更點出參與者的心思：

> 余丁未（1607）歲典漕事，過武林，得窮西湖之勝，已而循例行縣，遊天目山，作遊天目山紀，適當雨雪，抒寫奇幻略盡。潛志久不載，載之自余友孫子長公始。余與公同官白門，雅望傾部寮，嘗嚴事之。至公守杭，為西湖長，因念天目實西湖主山，洞霄之間，伐石丹鉛，大殘來脈，命張生明著於編，垂為永誡。並以生平嘉賞才人韻士之句，私心嚮往而車轍馬跡不及至之境，舉屬之梓人，曰，庶幾以當吾臥遊。嗟乎，公念西湖而護持天目，宗本也。政有本原，公之治杭亦若是則已矣。張生名之采，字去浮，余過武林時所引重士，公命既及，志成，乞言以弁。余維爰爰小草，方藉公不遺，與天目並久遠，乃公顧藉余言哉，姑述其修志之本意，且百代而下，猶令人想見公，公餘之適，而杭之所以治，轉可思已。[58]

孫昌裔之所以動念為天目作志，乃因其為西湖主山，他先是整頓其地，見「洞霄宮白泥山一帶，其過脈也，為居民剝琢丹鉛，毀殘幾盡」，於是三申五誡，此事甚至被列為《三修西天目志・凡例》的第1則，[59]足見其重視，也要後人牢記其用心。孫氏護持天目的舉措除實際治績之外，也包括出版志書，既紀錄其間勝景，也廣為搜集古今才人韻士暢遊之後的吟詠詩文，直到付印前的最後一刻。[60]張京元作於戊申年（萬曆三十六年，1608）的〈西天目紀遊〉原本一直未能收入當地志書中，因孫昌裔見賞，而終得以出現在天啟四年刊刻的天目山志書裡，也於之後刻印的諸種明刊本《西天目志》中流傳。張京元為

---

[57] 〔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凡例〉第 7 則，頁 25b-26a。

[58] 〔明〕張京元，〈題三修天目山志〉，收入〔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頁 4a-6a。

[59] 〔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凡例〉第 1 則，頁 25a。

[60] 〔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卷 3，〈詩文〉，頁 50a-b 收錄姚鏜的六首詩，並附註：「志成矣，六詠見寄，遂增入。」

其文將藉此志書傳之久遠而欣喜，他的回報便是在序文中盛讚孫昌裔的貢獻，以期可隨此本志書而廣為後人所知。張京元的序文顯示出，他對於印刷書籍有助於個人著作及事功的流布，有極為清楚的自覺意識，主其事的地方官員不但能彰顯個別治績，也可置入個人與周遭友人的詩文，藉以名揚後世。這應當也是促成地方官員不斷重修地方志書的主要動機。相較於商業書坊或個人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改編、翻印《西湖遊覽志》，[61]藉由志書承載的內容以名垂不朽，當是這些地方官員更看重的向度，此一願望也因雕版刻印的普及化而成為可能。

孫昌裔在同一年（1621）也刊刻了《于忠肅公集》，該書是杭州當地名臣于謙（1398-1457）的奏議與詩文合集。李之藻（1565-1630）在〈合刻于忠肅公集序〉中論及于謙乃「浙之文臣有大功於國者」，但卻受讒蒙冤，其言行值得受到更多重視，並謂「太守孫公昌裔下車，景行前喆，得公詩集奏疏二種凡若干卷，合梓郡齋，藻頃從客舍，又得旌功舊本，中有程篁墩序，語多關係，併寄付梓」。[62]此書所用紙墨和採用字體等物質條件都非常講究，遠勝《三修西天目志》，或因在內容與面對態度上都更為嚴肅所致。孫昌裔自言：「昌裔守杭時，每尚論其土之先賢」，如岳飛（1103-1142）與于謙等，他之所以刊刻此書，「今集與國史並傳，按方治病，豈無可施用於今者」，[63]有取法前哲之意。搜集鄉內名臣著作，並刊刻書籍以廣其流傳，亦是作為地方長官的他在文化傳承上著力的另一表現。[64]

張京元與張之采的交遊，遠早於孫昌裔到杭州上任之前。在張之采為下一個版本之《西天目山志》所作的〈修天目山志述〉中，他提及「丁未（萬

[61] 見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頁 117-127 之分析。

[62] 〔明〕李之藻，〈合刻于忠肅公集序〉，收入〔明〕于謙，《于忠肅公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啟元年[1621]孫昌裔刊本），頁 1a-10b。

[63] 〔明〕孫昌裔，〈于忠肅公文集序〉，收入〔明〕于謙，《于忠肅公集》，頁 1a-8a。孫昌裔任杭州知府的時間不長，此書序文中所署官銜已是「欽差提督學政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64] 〔明〕彭澤修等編纂，〔萬曆〕《杭州府志》（臺北：學生書局，1965），卷 53，〈藝文上〉，頁 844，「諸公署鏤板」項下亦紀錄有《于公奏議》，可見在此之前的官府也曾刻印此書。

曆三十五年）仲冬，廣陵張鍾山先生董漕事，駐節虎林」，當張京元欲出游時，常招張之采等人同往。1608年張京元為天目游，張之采因參加蒲坂李水部公（即李紹賢之父李養賢）伯仲的文會而無法成行。文中也交代了張之采與促成編纂《西湖合志》之李紹賢的交誼實可溯及萬曆年間。由此觀之，身為諸生的張之采和不少歷任的地方官員交情匪淺，而且可能因為他對鄰近之名勝所知甚深，成為訪察名勝古蹟的最佳遊伴，亦是編纂名山大川志書的首要人選，張京元遂向孫昌裔推薦，「天目舊有志，已為徐令公與雲間喬千里更始，猶多未備，況近為火災。太尊遂慨然有蒐奇輯遺、一新山乘之意，辱命之」。[65]

《三修西天目志》保持徐嘉泰本二修的架構，主要的文字也大致維持，凡例中一一說明、補足了那些燬失的內容，也有增添者，主要是古今名人的詩賦，新蒐所得另刻一帙為卷之又3，這表示希望維持前志的基本樣貌，故對新加入者特別作出區隔。不過卷3與卷4所收作者之〈題詠姓氏〉是徐嘉泰鈔本中所未見的，該部分簡單說明作者的基本資料和收錄作品的數量，似可看出對於詩文部分的格外重視。此外，〈凡例〉中羅列了參與校閱編次者的名單，洋洋灑灑近六十人之多，鳩工視成者則是於潛知縣劉名世，可說是集官府之力刊印之作。

當孫昌裔增輯《西天目志》之際，也想要一併為東天目山作志：「與張生方謀為合志，時當入覲，不果。春來，復有治水之命。幸嗣予守者鶴汀李年兄，胸貯二酉，筆搖五嶽，成未竟之緒。」[66]鶴汀即天啟二年（1622）就任杭州知府的李燁然（1584-?），他對於編纂志書也有濃厚的興趣，[67]「爰屬諸生張之采探獵其概，復與二三寅友取次訂核，亦既爛焉成帙，付之剞劂」。[68]書成已是天啟四年。這次不但編纂了史上第一部《東天目山志》，並初次與《西天目山志》合刊：「西志凡再修而燼於火，孫太尊三修之，今奉李太尊

[65]〔明〕張之采，《西天目山志》（濟南：齊魯書社，2001），卷 1，〈修天目山志述〉，頁 166。
[66]〔明〕孫昌裔，〈東天目山志序〉，收入〔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頁 113。
[67]〔乾隆〕《杭州府志》，卷 62，〈職官一〉，頁 551。書中誤作李「華」然。
[68]〔明〕李燁然，〈東目山志序〉，收入〔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頁 111。

命，約略其槩，與東志合刊，一覽而兩目宛然矣。」[69]張之采還是主要的編撰者，不過東天目山所在的臨安知縣姚鏜也有參與。[70]他在為《東天目山志》作跋時曾說明作志緣由，並羅列參與其事者：

> 鶴汀李公守郡，百務振舉，公餘披閱山水志乘，念東目蕪沒，昔日琳宮瓊搆，半已蕩為荒烟，鞠為亂艸，迄今無數行紀載，徧加蒐討，司馬徐公，司李陳公，一時偉人，復殷殷聚，而襄厥成。鏜不敏，宰臨水，竊願附不朽，鳩良材，善梓之，于是兩山有全乘矣。[71]

所以新輯之《東天目山志》仍是由編纂《西天目山志》的原班人馬負責，實際的刊刻之務則委諸知縣姚鏜。

我們若比較天啟元年與四年的兩本《西天目山志》，會發現後者是在前版的架構與內容上重新編輯，並調整部分項目的順序，分類看似更多，其實大部分只是分得更細，〈仙釋〉、〈巒泉〉（原〈山水〉）、〈寺剎〉（原〈寺觀〉）等部分甚至還刪減了不少文字，[72]確實如凡例所言是「約略其概」。出入最多者當是卷3與卷4的詩文。三修本中放在這兩卷之前的〈題詠姓氏〉，被集中並闢出新增的〈遊屐〉類，置於卷2之末，是唯一可稱為新增的類目。不過並非所有作者都有收錄，姚鏜在卷末的識語指出：「凡游不識字號里宦者不載；本邑人非遠游不載；其後游者俟嗣載。」[73]

卷3〈古今詩〉是全書變動最大的部分，刪削了不少前志所收的詩句，而且不論明前或當代。與杭州歷史緊密相連的詩文名家蘇軾（1037-1101）的作品由四首刪為三首；徐渭（1521-1593）從九首減到七首；田汝成之子田藝蘅（約嘉靖、萬曆間人）之詩由七首變為二首；王在晉（?-1643）更由收錄十二首到完全消失。事實上，王在晉的作品在之前第二版的徐刊本中甚至有十八首之多，原因很簡單，他替徐嘉泰刊本作了序文。[74]

---

[69]〔明〕張之采，《西天目山志》，〈凡例〉第 1 則，頁 168。

[70]兩部志書的凡例、與各單元之前的總說，皆署名「令華亭姚鏜」。

[71]〔明〕姚鏜，〈東天目志跋〉，收入〔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頁 162。

[72]即便〔明〕張之采，《西天目山志》，〈凡例〉第 2 則，頁 168 曰：「巒泉寺剎，關係勝跡，無不詳載。」詳細比較之下，仍可發現刪減之處頗多。

[73]〔明〕姚鏜，〈游屐〉末之識語，收入〔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頁 195。

[74]〔明〕王在晉，〈王觀察在晉重修天目山志序〉並未出現於現存的徐嘉泰本鈔本

各本天目山志書中所收錄的紀遊詩，以明後期的作者佔絕對多數。晚明時期旅遊文學的蓬勃發展固然是部分原因，但被納入者未必是當代或後世所認可的名家，反而多是主事者、編輯群及其友人，因此每個版本都會有不少變動。四修本中當然有推動最力的兩位知府孫昌裔及李燁然的詩，幾位臨安與於潛知縣，如姚鏜、馬配乾、劉名世等，也都因在不同時間點上參與其事而列名其間。有趣的是，協修兩本志書的徐文龍、陳懋德，和為新版《西天目山志》寫序文的吳煥等人，都曾陪同孫昌裔遊天目，並分韻賦詩，也一起被收入卷3中。實際負責纂輯的張之采，甚至將他在天啟元年受命前往天目山採集資料途中隨地口占之九首詩別為一帙〈附游西天目詠〉，置於卷3之末，和他同遊的嚴爾珪得以納入，而來不及跟上這趟遊程的劉名世，以及讀他〈天目紀遊〉後唱和的呂胤礽也均列名，可見人際往來的因素絕對勝過文學價值的高低。正如前文所提，張京元一心想將他的遊記載入郡邑方志而未得，但終得放進《西天目山志》中，參與志書的編纂、校閱或刊印固然是種功績，讓個人作品藉之名垂後世，相信也在他們的考量中。

由於一開始就決定要與《西天目山志》一起刻印，又是同一批編纂者，《東天目山志》的架構與體例都仿照已有相當規模與歷史的《西天目山志》。高金體的序文中說明了修志的經過：

> 邑侯黃調吾嘗修邑志，東山巒剎附見什之二三，時予把玩，亦謂差快。迺鶴汀李郡尊甫下車，慨西志之既成，而東南半壁望之削色，簡委張友去浮，衝寒雪入山，廣探獵，獻之公所。余聚族而謀，凡有聞見，手錄而投之奚囊以歸，未幾志成。[75]

同文中還提及，東天目山的勝跡過去也有部分附見於縣志中，但山志與縣志

中，但保存於稍晚出版的《西天目祖山志》，頁 515-517。崇禎版《西天目祖山志》今日也已佚失，流傳至今較早者為 1803 年禪源寺住持釋際界據心海的舊志增訂之版本。該書〈凡例〉第 1 則敘述《西天目山志》的沿革，也慨歎舊版不夠完善，但「崇禎戊寅（十一年，1638）心海師所輯祖山志，理事諧暢，今秉以為粉本，略加圖乙而已」（頁 21），則其與明崇禎版應很接近。但因書中確實也添加許多清代史事，本文雖以此版本為據，卻無法絕對斷言哪些部分為原明版的內容，故不多加演繹。

[75] 〔明〕高金體，〈東天目山志小引〉，收入〔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頁 118。

各有不同偏重，在山志中，山水與梵剎的記述應更為完整，紀錄勝景的傾向相對突出。[76]文中張之采「衝寒雪入山」實地考察之行發生於天啟甲子（四年）春，張氏本人在〈修東天目山志述〉中亦敘述甚詳。[77]

《東天目山志》的篇幅遠不及《西天目山志》，除了東天目山所受到的關注本就難與西天目山爭勝之外，也因「東西兩目景物大同，題詠互見，向時修西志者期于點綴山靈，多以東目之勝并入，遂令考核無據」。[78]編輯者因此需要先加以區別和說明。[79]傳世題詠詩文或許也因之較少，當代作品則是壓倒性地多。編纂者雖自稱：「題詠得之郡邑志、諸名公文集、及寺僧壁間、士夫詩卷扇頭、或郵筒見及，未有不急錄付梓。此外即有佳什，非耳目所及，以俟嗣刻。」[80]編輯群與地方官員顯然還是得到更多的曝光，包括出現姚鏜〈立春見雪和張去浮韻〉、〈張去浮以修東目志來卻寄〉這樣相互援引與唱和的題材，和《西天目山志》中所見的情況相似。

從萬曆到天啟，這一系列由地方官員主修的《東西天目山志》，似乎很難讓大家都滿意。尤其西天目山上有禪源寺、獅子正宗禪寺、大覺正等禪寺等歷史悠久的禪宗重要寺院，不獨具有旅遊名勝的意義。崇禎十一年（1638）遂有心海禪師重輯《西天目祖山志》刻印，時間猶早於兩部《西湖合志》的刊印。釋大香的跋說：「形勝必假文言以重，文言亦假形勝以奇。……所以台宕有志、黃山有紀、震澤有編、西湖兼有志餘，獨天目一書所出，輓近徒為明光負版之裁，寧免靈物埋塵之救。」[81]吳太沖的序文也歎「憫舊志之蕪穢，無以稱盛德、備典故」。[82]由於一般郡邑方志很少記載寺院之事蹟，[83]若

---

[76]編纂者對於山志和邑志之區隔應頗有自覺。如張之采編纂《西天目山志》時即表示，潛志中既已有人物之傳記，便不再重複。見〔明〕張之采，《西天目山志》，〈凡例〉第 3 則，頁 168。

[77]〔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修東天目山志述〉，頁 119-120。

[78]〔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凡例〉第 1 則，頁 121。

[79]如徐渭的〈瓦觀音〉等三首詩下就註明：「俱誤刊《西目志》，今燬。」見〔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卷 3，〈古今詩〉，頁 143。

[80]〔明〕張之采，《東天目山志》，〈凡例〉第 3 則，頁 121。

[81]〔明〕釋大香，〈天目志跋〉，收入〔明〕釋廣賓撰，〔清〕釋際界增訂，《西天目祖山志》，頁 547-548。

[82]〔明〕吳太沖，〈西天目山志序〉，收入〔明〕釋廣賓撰，〔清〕釋際界增訂，

欲彰顯其歷史發展，唯有獨立編纂志書。細讀心海的版本，不但在篇幅上大幅增加，整體架構下之分項更達四十八種，增加最多者為佛寺的建置、禪僧生平、語錄偈頌等，形勝和紀遊詩文單元雖仍保留，比例上卻因稀釋而不再突出，少部分地方官員的詩文雖還保存，前幾版編纂群的作品則刪除殆盡，新增者較突出的則是僧人之作。可見在名勝志書中，相較於歷久不變的自然山水、與人為建置的寺剎亭閣，紀遊文學的內容是最為浮動可變者，往往因編纂者的組成和考量而大不相同。

這個由僧人主編的版本也提醒我們山志的另一個層面，亦即山志和寺志的混融與分界，此議題在《徑山志》的發展中更為突顯。

三、寺志抑或山志？《徑山志》的性質

徑山與天目山無論從位置或命名的角度來看，關係都十分密切。遊記名家慎蒙曾討論徑山的名稱由來：

> 嘗讀《武林志》，謂徑山者，往天目則在所必由之徑，故曰徑山。又以此徑於餘杭、臨安二縣為會通，故以徑名。然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則自唐和尚名法欽號國一者問其師曰：「吾欲建選佛場以卓錫，將何歸？」答以：「遇徑則止。」[84]

但也正如文中後半段所顯示的，從現存記載看來，徑山並非以自然景觀著稱，最引人關注者其實是興聖萬壽禪寺和化城寺這兩座歷史悠久的重要名剎，引文中提及的國一正是興聖萬壽禪寺的開山祖師。相較於西天目山兼具自然美景和佛教史蹟，因而促生了山水成分居多的《西天目山志》與寺志性質的《西天目祖山志》，寺院史蹟在徑山志書中的重要性遠勝於山水名勝，與前節所討論的情況恰成對比。明代最重要的徑山志書應屬宋奎光纂輯之

《西天目祖山志》，頁 522-524。

[83]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338-339, note 61.

[84] 〔明〕慎蒙，〈游徑山記〉，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卷 7，〈游記〉，頁 689。慎蒙文中略述徑山寺之早期歷史，言其肇建於唐，而在宋孝宗敕賜「興聖萬壽禪寺」之額時達到極盛。

《徑山志》（天啟四年刊），雖非出自僧人之手，性質實屬寺志。該書主修者為杭州知府李燁然，由他所主導的《東西天目山志》也是於同年完成，從兩者呈現的迥異面貌，足見他清楚認定二山性質之不同。像這樣名為山志、實為寺志的現象，在晚明絕非孤例，但若放在《西湖合志》系列志書的脈絡中，格外能看出西湖山水志書性質的豐富與複雜，因此本節將詳細追索分析其成書的過程與特性。

在晚明人的認知中，名山與名寺每每相互依存，編纂寺志之舉也往往和輯印山志相提並論。釋德清（1546-1623）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為徑山化城寺僧澹居法鎧未竟之《徑山志》所預寫的序文云：

>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不志則無所考其源流，窮其窈眇，探其靈勝，故使覽者披圖了然，若身履其間，謂之臥游，豈徒說哉。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托跡于名山勝概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為野史，而佛法之志則僧史也，苟無所考究，則何以遡法界之真源乎。[85]

宋奎光稍後輯成的《徑山志》，在內容與體例上都有意識地區隔在名山勝概間「探奇仰異」與考究琳宮梵宇之「道脈」的差別，〈凡例〉開宗明義便曰：「凡誌名山者，類先形勝，以泉石得名故，徑山雖勝甲海內，實以祖席獨著，故首志列祖。」[86]強調徑山之得名非徒以名勝，燈燈相續、法席稱震旦第一更是吸引遊客的主因。與諸多僧人往來密切，也以撰遊記著稱的小品文名家黃汝亨（1558-1626）在序文中進一步說明其重要性與作志之因由：

> 雙徑界禹杭、臨安，通東西天目之徑，是東南最勝道場也。自唐國一師開山，至月林鏡師為八十七代，稱天下徑山與少林祖庭而二。諸山志余不盡見，所見清涼質而該，補陀雅而博，南屏秀而麗，靈鷲近乎俚矣，獨徑山向無舊志，萬曆初年有僧宗淨者，刻《徑山集》，載諸祖事，十之二三，僅存其名，……詩文亦寥寥。戴令邑志更自簡少。達觀禪師昔謀刻大藏，易以書冊，廣為流通，澹居鎧公承之，與吳本如諸

[85]〔明〕釋德清，〈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卷 4，頁 396-397。

[86]〔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凡例〉第 1 則，頁 51。

公恢復化城寺，貯此刻板，事甫就而入滅，任此志者，遂虛無人矣。[87]

興聖萬壽禪寺自唐國一師開山稱徑山寺，到天啟初已傳承八十七代，是徑山的重要古剎，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已被品第為禪宗五山之一，[88]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整體來說，寺志的出版也如其他地方志書般，是在晚明時期大盛，[89]萬曆間不少名山古剎都已先後有志書問世，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釋宗淨所撰的《徑山集》今存有萬曆七年（1579）重刻本，內容主要是歷代僧人生平、與古今關於寺院的紀錄和遊記，應可視為寺志。不過在方壹為該書所作的序文中已慨歎「魯魚亥豕者屢出」，但因「後人莫敢妄為之臧否耳」，而無法改動其誤謬，[90]何況內容也多所不足。如前所述，化城寺僧澹居法鎧本有意撰志而未成，最後是由宋奎光纂修成書。此書傳世刊本不少，經比對內容可知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刊本，[91]可見應該頗受重視。宋奎光在天啟四年的跋文中自云編纂之緣起：

---

[87]〔明〕黃汝亨，〈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33-37。

[88]〔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 14，〈方外玄蹤〉，頁 466：「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為禪院五山。」天童寺於崇禎五年（1632）方有寺志，〔明〕張廷賓，〈天童寺志序〉曰：「徑山、靈隱、淨慈、育王皆有志，出名僧巨公手。」見〔明〕釋通布，《天童寺志》。文中之徑山有志，當即是指此書。轉引自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51。

[89]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181-183.

[90]〔明〕方壹，〈重刻徑山集序〉，收入〔明〕釋宗淨撰，《徑山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頁 10。《徑山集》乃因末有萬曆七年（1579）跋而定年，見頁 109。著錄中另有一本由餘杭縣令高則巽主修的《徑山志》，刊刻於萬曆十三年（1585），存世唯見存於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筆者尚未得以見到此刊本，但在天啟刊本《徑山志》中從未提及有此一刊本存在，黃汝亨與李燁然的序文中甚至都說徑山舊無全志，或許在當時便已佚失，對宋奎光本影響當亦不大。

[91]筆者曾寓目之《徑山志》刊本有北京首都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等藏本。從附錄與內容之異，顯示至少曾經有三種不同的版本。臺北國圖藏本狀況單純，卷末之助印資料亦多，可能為較早刻本，《中國佛寺史志彙刊》輯 1 冊 31-32 影印收錄，為本文之主要根據。中國科學院藏本有一頁附圖，為其他刊本所無。首都圖書館的內容較多，其中卷之 7 除多出兩篇遊記之外，未列在該卷目錄中的末篇並署有「崇禎庚辰（十三年）佛誕日」，可知已是較晚的刊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44，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乃據此刊本影印。

> 會郡侯汶上李公，政事之暇，繫情山水，已命諸生張子輯錄《兩天目志》，釐而授之梓人，曰徑山無志，亦缺典也，以其役屬之光。重以嘉命獲余夙心，因稽之名宿所藏，考之諸祖語錄，旁搜之先達所撰塔銘碑記，而復印之宗淨所輯《徑山集》與府縣舊志，凡得若干卷。[92]

宋奎光曾經參與天啟元年版《三修西天目志》的校閱工作，[93]對纂輯志書已有經驗。轉向寺志的編纂方向，當應經過主修之杭州知府李燁然所認可。李燁然自己在序文中曰：

> 顧徑山舊無全志，以去省會稍遠，而禪那幽杳之地，鮮有過而問焉者。今年首夏，適餘杭博士宋君來謁，詢以徑山去餘杭幾何，曰，一由旬耳。因命往搜故實，凡三閱月而稿呈，首列祖，次制勅，次序文，次塔銘，又次碑記、游記及名勝等若干則，凡為帙若干卷，予為披繁理緒，考證而銓次之，又一閱月始竟。自唐宋歷元至我明，千餘年間，祖庭之盛衰，名勝之隆替，與人物代興，制作彪炳，稱大備矣。[94]

他在文中也提到「名山法脈幾不復振，自雲棲以一聲佛號續佛慧命，而永明辨才諸風賴以不墜」，顯然對於淨土宗禪僧雲棲袾宏（1535-1615）相當尊崇。[95]除了個人興趣之外，也因身為杭州知府的他，免不了要想起曾先後在杭州任太守，也留下卓越政績的文學名家白居易（772-846）和蘇東坡。這兩人不但留有白堤、蘇堤，可證其清濬西湖之功，也都對佛法有興趣，並且和禪僧往來。李燁然就任後也欲追法先賢清濬西湖，但「及今而梗乃愈多」，字裡行間隱隱透露其不易。我們若比照《增輯西湖合志・凡例》的第2則，或許便能明

---

[92]〔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跋徑山志〉，頁 581。此篇未見於臺北國圖本，但中國科學院、上海圖書館、與首都圖書館本皆存之。

[93]〔明〕孫昌裔撰，《三修西天目志》，〈凡例〉第 9 則，頁 26a：「校閱學博仁和呂胤礽、於潛嚴錫、禹杭宋奎光，一時孝廉之選。」

[94]〔明〕李燁然，〈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5-7。

[95]〔明〕李燁然，〈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8。袾宏在隆慶五年（1571）至五雲山重建雲棲寺，為晚明重要高僧，與文人往來密切。關於雲棲袾宏的生平，與其在晚明佛教中的重要性，請參見荒木見悟，《雲棲袾宏の研究》（東京：大藏出版社，1985）。

白其間幽微：「湖中隘塞，士夫攘為生業，唐突西子。太尊李鶴汀、中尊沈愚公矢心清濬，而不勝阻之者，率爾報罷。乃知白蘇適逢山水五百之運。予筆此猶有望于名賢之載起，觀厥成云。」[96]仰慕白、蘇的李燁然既然無法清濬西湖，於是便轉向編纂志書：「余何敢自附于白、蘇，第以兩公所拂拭者西湖之形勝，所揚抶者徑山之宗旨，余亦欲兩存之。」[97]相比起來，宋奎光不過花三個月便呈上志書的文稿，他再花一個月校訂，便可付梓，實在比清濬西湖要容易得太多了。作序的陳懋德顯然也十分了解李燁然的心情，所以說：「汶陽李文若先生，以白蘇之後身，作徑山諸祖之護命，又得宋元實氏，慧手輯志而刪定之，其於山靈道心兩俱無盡矣。」[98]

此書共有十四卷，篇幅亦有五百多頁，比起之前討論的諸本《西天目山志》卷帙要龐大許多。宋奎光的跋雖稱李燁然「捐廉刻其板，藏之山中」，[99]但在卷6到12之間，有多卷之末都註明由「餘杭丁應標」或「傳衣庵僧海耀」等人分別助刻，顯然還得尋求外在的贊助後才終能付印全書。反過來說，正因編纂或助印寺志也是文人及民眾參與寺院事務或提供贊助的具體途徑，[100]相對於純粹的山志，以佛寺發展相關文獻為基調的《徑山志》，不但使主事的地方官員成為「徑山諸祖之護命」（前引陳懋德語），或許也更容易得到地方官員以外人士的支持與贊助。

細察其內容，共十四卷的文字區分為十七類，最突出者莫過於以〈列祖〉和〈法侶〉居首，提供自初代到最近之住持與相關著名僧侶的傳記。高僧傳是宋元時期寺廟史主要採取的編纂方式，但到晚明已逐漸轉變成以志書作為主要的文類，[101]此書雖是志體，卻保留相當豐富的高僧傳記。佛教方志在晚

---

[96]〔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凡例〉第 2 則，頁 2a-b。同書中郭必昌於 1636 年所作之〈西湖合志序〉（頁 4a-5b）也提到西湖沿岸被占的情況甚為嚴重，「此李鶴汀、沈愚公咨嗟扼腕，矢心必清必濬」。可惜因豪右掣肘，並未成功。

[97]清濬西湖之事可見於〔明〕李燁然，〈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9-11。

[98]〔明〕陳懋德，〈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28-29。

[99]〔明〕宋奎光輯，《徑山志》（《四庫存目》版），〈跋徑山志〉，頁 581。

[100]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178-181.

[101]馬德偉，〈中國佛寺志初探及書目研究〉，頁 387。

明才逐漸定型，[102]今日見存之各種明代寺志的體例出入仍甚大，但強調僧史的編輯方式也使此書特別向寺志傾斜。其次的〈制敕〉、〈序文〉、〈塔銘〉等也都謹守佛教文獻的方向，與人物相關者另有護持佛教之〈外護〉，明顯是從寺院的角度出發。[103]一般山志中通常最重視的勝景部分仍出現於書末的〈名勝〉與〈古跡〉，但和〈游記〉一樣，其篇幅相對而言並不算多。詩句收錄於〈偈詠〉、〈名什〉項下，分別是僧人與文人的作品，文人的紀遊詩雖也是以明代居多，但常可見到題寺庵或訪禪師的主題，宗教意味濃厚。〈凡例〉中還特別強調：「列祖而下即載制勅及序記諸篇，以弘暢祖風，繪寫名勝，山靈增重，故舊套圖畫形勝悉裁革。」[104]在「祖風」與「山靈」之間，宋奎光顯然是有意識地選擇以前者為重。

正因名寺與名山相互依存，寺志與山志往往也密不可分，雖各有其偏重，卻不易斷然區隔，因為多種寺志皆冠以「山志」之名，尤其無法直接從名稱上辨認。一般認為佛教方志始於《洛陽伽藍記》，[105]絕大部分的寺志是於明萬曆之後才出現，[106]在現存近百種的明代佛教方志中，浙江地區佔幾近四成，光是杭州府就佔總體約一成五之多，乃全國之冠，[107]這不但是因為杭州素有「東南佛國」之稱，或許也和浙江地區編纂方志風氣之盛有關。[108]寺院隱於山中本為清修，但在晚明實已是士紳旅遊、民眾進香的好去處，[109]寺志

[102]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4。

[103] 杭州幾座名剎的寺志如《西天目祖山志》、《上天竺講寺誌》、《慧因寺志》等多闕有此類，或稱「檀那」或「檀賢」。

[104] 〔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凡例〉第 8 則，頁 53。

[105]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4。

[106] 馬德偉，〈中國佛寺志初探及書目研究〉，頁 390。

[107]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62-75。書中表二之既存者共八十七種，浙江有三十二種、其中杭州即有十三種。已知佚失者共六十五種，浙江有二十四種，杭州為五種。本文中所討論的《三修西天目志》與《徑山志》都名列其中。嚴格說來《三修西天目志》並非寺志，被列於曹剛華表中，正可顯示山志與寺志無法絕對劃分，有重疊的模糊地帶。

[108] 根據巴兆祥的統計，明代曾經修纂的方志至少有三千多種，若以今日的行政區劃來看，無論現存或已散佚的數量均以浙江居冠。見巴兆祥，《方志學新論》，頁 71-76。

[109] 士紳訪寺不只為宗教性的參拜，也有文化及審美的向度。見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108-113. 關於杭州寺觀宗教活動與西湖旅遊的密切關聯，見

中遂出現比前代更為突顯山川勝景描繪的趨勢，[110]與同時期旅遊文化的蓬勃發展當亦脫不了關係。

對於山志與寺志的關係，當時即已有各種不同層次面向的論述。檢視明末杭州的幾種寺志，徐時泰為慧因寺志作序，認為形勝使「地道昭矣」，又加入圖像題詠，「則游之者具矣」，[111]該書將「景物」就放在記寺之興廢的「原始」後的第2卷，當亦考慮到「游具有需」。[112]另一名剎南屏淨慈寺之寺志甚至將〈形勝〉置於首卷，且文章始於「敘曰：武林山水，西湖最勝；西湖山水，南屏最勝」。[113]縱使這是由僧人釋大壑所撰的寺志，勝景的位置卻仍如此突出。順治三年（1647）孫時偉為上天竺寺志作序時曰：「然則大士何戀於是山，山何贅以是誌？……藉山以宣大士之教，即藉誌以著茲山之奇，因是而可大可久。」[114]或許正是在這種旅遊凌駕於佛法的氛圍中，使得宋奎光逆勢操作，刻意降低名勝與紀遊文字的能見度，轉而以寺院及僧人為中心，更在跋文中明白昭示：「而僅以供游覽之具，則惧抑滋大。」[115]

《徑山志》的另一個特點，是收錄相當多士僧之間的往來書啟與唱和詩文。文人與僧人的互動在晚明已是常態，如袾宏、達觀等禪僧均與文人有密切的往來，[116]《徑山藏》的刊刻更深化了彼此之間的合作。[117]相關文獻散見

Wang Liping (汪利平), "Paradise for Sale: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1589-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89-137.

[110]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94、108-109。

[111] 〔清〕徐時泰，〈序〉，收入〔明〕李飛侯纂，《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頁 9：「是故首之以沿革，則寺之興亡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圖像題詠，則游之者具矣。」山志與寺志關係之討論亦見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27-31。

[112] 〔清〕徐時泰，〈序〉，〔明〕李飛侯纂，《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頁 10。

[113] 〔明〕釋大壑，《南屏淨慈寺志》（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卷 1，〈形勝〉，頁 183。

[114] 〔清〕孫時偉，〈重修上天竺山誌序〉，收入〔明〕釋廣賓纂，《杭州上天竺講寺誌》（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頁 122。釋廣賓亦是前文中《西天目祖山志》的編纂者。

[115] 〔明〕宋奎光輯，《徑山志》（《四庫存目》版），〈跋徑山志〉，頁 582。

[116]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93-96.

[117] 關於萬曆間《徑山藏》（或稱《嘉興藏》）刊刻的緣起，與徑山後來成為刻藏中心

於全書各卷，序文部分尤其完整，在〈凡例〉中亦明白展現：「馮開之、陸五臺諸先生與達觀禪師創刻方冊，藏版始于清涼，後移置寂照，再議置化城。則雙徑一區，遂為震旦流通法寶要地，以故刻藏諸序文一一錄載，以識諸名宿最上願力，今已悉萃于此。」[118]這些書信和募刻大藏的疏序不但見證了士人與僧人之間的緊密互動，更是重建《徑山藏》刊刻過程的第一手史料。宋奎光深刻理解此事對於徑山的意義，也刻意在編纂過程裡突顯，兩者可說都是整理保存文獻、以出版流傳護持佛教的實踐。萬曆間不僅徑山寺供奉了神宗頒賜的大藏經，[119]興盛萬壽禪寺及化城寺也先後有刊刻、收貯由民間士紳和僧人通力合作之另一套重要大藏經的殊勝因緣，並因此促成寺院的重修，使之氣象一新。當天啟年間編修《徑山志》時，刻藏工作亦正在進行中，難怪黃汝亨在他的序文中兩次說此書「是徑山中興之書也」，[120]也難怪對佛教很有興趣的李燁然會支持以寺志的面向呈現徑山。正因紀錄徑山佛教復興景況的《徑山志》亦有彰顯此事的重要貢獻，遂極不尋常地被收入了《徑山藏》中：「刻板若干塊，送入本山常住，附大藏流通，其刷印板頭，規例俱照楞嚴寺定額，不得增減。」[121]由此亦可見，《徑山志》、《徑山藏》和徑山寺其實是緊密相關聯的。[122]

除了與佛教文獻直接相關的類目之外，將書中之遊記、紀遊詩與之前諸本天目山志相比較，仍會明顯感覺到參訪寺院史蹟或提及禪師事跡的篇幅更多，這當然可能也是徑山本身的性質與天目山不同所致。當代的主要編纂修訂者、甚或捐資助刻的王祺、王福貞等人的詩也獲入選，和前節所見的狀況

的過程，請見釋法幢，〈徑山刻藏考述〉，《中華佛學研究》，13（2012），頁 58-66。

[118]〔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凡例〉第 4 則，頁 52。

[119]萬曆二十八年（1600），神宗曾頒賜大藏經予徑山供奉。見〔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卷 4，〈制敕〉，頁 359-360。

[120]〔明〕黃汝亨，〈徑山志序〉，收入〔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頁 39、42-43。

[121]〔明〕宋奎光輯，《徑山志》（臺北明文書局版），〈凡例〉第 14 則，頁 54。

[122]馬德偉指出，藏經雖時見增添新內容，但通常並不收錄新舊寺志或山志。釋法幢也強調，《徑山藏》被收入《徑山志》的「拾遺」類中，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見馬德偉，〈中國佛寺志初探及書目研究〉，頁 389-390。釋法幢，〈徑山刻藏考述〉，頁 83。

仍很接近，紀遊部分果然還是最適合作為酬庸的空間。有趣的是，遊徑山的主題屢屢出現「次蘇長公韻」，在橫跨數百年的唱和中呼喚杭州最重要的流寓文人與佛法護持者蘇軾，不免讓人想起修志的李燁然心念之所繫。

四、從西湖到天下：名勝志與名山遊記的融合

當我們分別對西湖、天目山、與徑山之志書從萬曆到崇禎初期的發展作一檢視，便可以再回頭仔細觀察崇禎後期出版的兩部《西湖合志》的特性。《增輯西湖合志》雖是在萬曆末年印行之商本《西湖遊覽志》、與天啟年間刻印的《東天目山志》、《西天目山志》、《徑山志》這幾部既存地理志書之基礎上，再加以改編統整而成，但各書的體例、篇幅、甚至重點方向都不一致，勢必得再經過一番編輯的功夫。取捨之間，用心自然浮現。編輯合志首先面臨的是統整數種志書之間不同體例的問題，章之采特別在〈凡例〉中加以說明：

> 兩目詩行賦紀，人為一目，蓋勝跡數處，可以類分。西湖四處皆勝，累帙難罄。詩人隨處有題，類分尤煩，故于名勝之下，載以題咏，覽者易見山水面目，并得臨眺名公襟况。[123]

在《東西天目山志》中，是以山川亭臺等類型先作區分，再一一列述個別勝蹟，但對於各類內容都太過豐富的西湖而言，雖然坊間也有如《西湖志類鈔》（1615）這樣為名勝分類以述的書籍，章之采還是選擇依循商維濬刊本《西湖遊覽志》的體例，以區域或旅遊路線作為架構的主要原則。

《西湖志》部分雖是承商維濬改編之《西湖遊覽志》而來，但編者對後者顯然還是有些意見：

> 西湖為天下名勝，志乘錯出，坊刻既陋，徐、沈、李、王諸編，搜獵多訛。田汝成輯本八帙，會稽商濬增訂為十二帙，較他書似備，然藉手俗工，繆飾己意，殊非大雅。且《志餘》一函，大半里諺市謠，傍出官署街衢，政同郡志，與山水何與？[124]

---

[123]〔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6 則，頁 3b。

[124]〔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3 則，頁 2b。

文中清楚標示與郡志區隔、以「山水」為主要考量的編輯方針。由於以搜列山水名勝為主，杭州城內的數卷不收；《志餘》所錄乃史事與軼聞，也盡刪去。餘下部分仍如商本，依十錦塘、南山、北山、吳山與浙江的順序陳述，各卷前的勝蹟總論十分接近，分區之後也依照一定的方向性介紹各個景點，各景點則是先述沿革，再錄紀遊詩。若再比較各條目的內容，合志本的內文已經較商本簡化，如此亦可稍微拉近與其他部分篇幅上的差距。

對章之采而言，《徑山志》等同於寺志的體例，尤其與其他志書格格不入：

> 志山水則言山水，期于洗發靈區，抒寫名勝。近有志徑山者，矯情立異，獨先列祖，竟同禪宗語錄，且志外護志宰官啟事，又同仕籍尺素。志寺產方員租稅，又同買山券，展卷俗殺。[125]

章之采於是將與禪僧最直接相關之列祖、語錄、靜室等部分都刪除，士僧間因《徑山藏》雕版而作的序文和書啟也從新版中消失，除了官方文書之制敕外，便是名勝、古蹟、殿宇等景點的條目，以及題詠的詩文，體例基本上和兩天目山志相同。整體而言，選取的中心要旨顯然是突出與山水遊覽直接關聯的景點、與文人之題詠文字，而且也以可作臥遊山水之資的名勝志取向，有意識地與郡邑方志和寺志相區隔。

再進一步看內容的增刪標準。名勝志雖以山水為重，但山水長存，改變的反而是人為的建設。尤其西湖久已是遊人如織的重要景點，[126]從公共建設的堤橋，到私人使用的園居，各種人為景觀時常有起落變動。商本西湖志很重要的精神便是因應西湖景物之變化而更新，「竊謂今日之志志今日之湖，庶幾近之矣」，[127]《增輯西湖合志》的條目繼承了此一精神，也有與時俱進的增刪，部分內容並有天啟或崇禎朝的明確紀年。[128]

---

[125]〔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徑山志》，〈凡例〉第 1 則，頁 1a。

[126]蘇州與杭州是晚明最重要的旅遊中心。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 230-232。

[127]〔明〕商維濬，〈西湖新志序〉，收入〔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商維濬瑞蓮堂刻本），頁 3a。

[128]如天啟元年寶所塔火災延燒彌月，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卷 8，〈北山勝跡〉，頁 7b；以及崇禎初在五雲山闢徑以通西山的新建設，見卷 11，〈北山勝蹟〉，頁 12a。

比較特殊的是在「昭慶寺」條目後加入這麼一段文字：「寺前湖際有秦樓片石居數十椽，凭欄眺望，低挹波光，鱗砌生韻，舊志絕載。何故？至于酒帘招搖，旗亭踴簇，名妹佐歌，檀板遠聽，湖舫延注，又是一段風景。」[129]昭慶寺是律宗的重要寺院，位於錢塘門外，離湖不遠，乃是北山旅遊路線的起點，遊人多在此投宿休止，但因此也成為市集湊聚之地，幾乎「無日不市」，[130]在時人眼中無異於「一賈肆也」。[131]臨湖之酒樓在時人紀錄中確實是群飲賞景的最佳去處，[132]但此類商業化的市肆在《增輯西湖合志》第一次進入了西湖志書的記載，似可見到編纂者對商業性旅遊活動並不避諱的態度。

其他新增條目多為重修或新築的建物，而且在附加文字中往往也如此例般載有豐富的人文活動說明，甚至在提點全書精神的〈凡例〉裡強調。比較突出的是當代文人在西湖邊新構築的園居或建設：「湖裏外新築精舍，名士下幃，特起崇搆，神天高拱，皆足掩映煙嵐，一一添入，但覺滿眼繽紛，迥非舊譜。」[133]由外地移居杭州、廣結友朋，並成為西湖文人圈中聞人的馮夢禎（1548-1605），其被「舊志所遺」之孤山快雪堂居所（1604年落成）便名列〈凡例〉中，編者「特揭為表章焉」。[134]名公之園居成為西湖畔景觀的現象，雖早在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裡便已有之，但不似《西湖合志》中突顯。茅坤（1512-1601）觀察到西湖園林數量大增的情況：「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游二十年間，勢家巨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齒錯于其遠近，不可勝數。」[135]證諸李鼎作於明末之《西湖小史》特別闢出〈三墅〉之單元，提及快雪堂和馮夢禎門生黃汝亨築於南山的寓林等；[136]張岱

[129]〔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卷 8，〈北山勝跡〉，頁 3b。
[130]〔明〕張岱撰，馬興榮點校，《西湖夢尋》（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28。
[131]〔明〕李鼎，《西湖小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七僧〉，頁 1197。
[132]晚明文人浦枋在天啟三年（1623）十月初七午後便曾「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群飲于上。巨觥滿酌，山色湖光盡浮酒面」。見〔明〕浦祊著，徐曉標點，《游明聖湖日記》（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1135。
[133]〔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4 則，頁 3a。
[134]〔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2 則，頁 2a。
[135]〔明〕茅坤撰，張大芝、張夢新點校，《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卷 20，〈翠微園記〉，頁 624。
[136]〔明〕李鼎，《西湖小史》，〈三墅〉，頁 1195。

（1597-1679）在清初回顧西湖南路柳洲亭一帶名人舊居及園亭於昔時之輝煌歲月，對比於今日之衰敝，不勝感歎欷歔，[137]亦可見明末時頗為強調名士園居，並視之為旅遊景點。[138]

另一類被標舉的景點，則是與本文探討之各種山水志的編纂群特別相關者。促成兩天目山志編纂的孫昌裔在書中屢屢現身，[139]他後來由杭守轉而督學兩浙，因事去職，章之采復募款為之建生祠。[140]我們可以看到以主編的章之采和主修之官員們為核心，向外畫出人際交往的網絡。十錦塘望湖亭有梅花嶼張兵憲振先別業，「章之采聚徒談經，蒲坂李印渚、古皖姚石嶺（即姚孫棨）相與文戰」，聯句所得還輯為《梅花嶼詩集》行世。[141]《吳山志・凡例》中長篇累牘地交代姚之蘭任杭州知府（萬曆四十三年就任）時，留意到因遭鄰祠火災波及、盡成灰燼之城隍廟的重要性而重建之，在繼任者孫昌裔持續的努力之下，於天啟二年重修告成。落成之際眾人分韻賦詩，身為姚之蘭門人的章之采也恭逢其盛，甚至就連諸人所作之聯句也違反常例地放在〈凡例〉中。[142]

除了參與景點的建設外，更多的是遊歷與品題的足跡，及吟詠的文字。

---

[137]〔明〕張岱撰，馬興榮點校，《西湖夢尋》，頁 184-185。

[138]此外，名士參與的興築與裝飾活動也屢屢被紀錄於書中。像汪汝謙（1577-1655）為崇禎七年（1634）才由王三德捐資重修的湖心亭三橋龍王堂佐工點染，也在〈凡例〉中提及。根據明人汪汝謙的《西湖遺事》，從萬曆到崇禎間，他參與了從南屏竹閣到重修湖心亭等多項美化西湖的建設工程。汪汝謙在西湖的建設可見曹淑娟，〈園舟與舟園——汪汝謙湖舫身份的轉換與局限〉，《清華學報》，36：1（2006），頁 218-219。龍王堂事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2 則，頁 2a。不過，編者在取捨之間也自有其標準，未必只按照眼見為憑：「俞尚書祠，今轉而為方伯生祠，為撫臺生祠，志中仍俞舊，不欲因後人之轉鬻，而沒先賢之跡耳。」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2 則，頁 1b-2a。

[139]如「先覺祠」是士夫雲集開講處，孫昌裔為杭守、吳亦臨為仁邑令時，「互相發明，一時理學奉為主盟」。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卷 2，頁 13a。

[140]〔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卷 2，頁 15a。

[141]〔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凡例〉第 2 則，頁 1b。

[142]城隍廟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就曾由杭州知府季東魯重修過，季東魯也曾刊印田汝成版《西湖遊覽志》，因此城隍廟可說是連結前後志書主修者的景觀。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吳山志》，卷 12，頁 14b。

章之采和友人結伴同遊之事被記錄下來，[143]曾為景點所作的題名也被突顯。[144]出現最多者莫過於章之采與主修的李紹賢之詩，[145]正如在《東西天目山志》中，張之采與其他參與者的詩文藉志書以傳，章之采和友人在《增輯西湖合志》中的曝光度顯然也特別高。

綜觀全書的編纂，可說是在強調名勝的架構之下，不僅客觀地交代景點的歷史沿革，也精選古今文人親歷遊覽之後的寫景與感懷詩文，透過他們的眼光折射出西湖畔的古蹟與名勝。前文所引〈凡例〉中「名勝之下，載以題咏，覽者易見山水面目，并得臨眺名公襟況」之語，便清楚地表明其意旨。只是此處所謂的「名公」也不那麼客觀，而是以編纂團隊的成員優先入選。另一方面，酒樓、園居、別業等文人群體交遊之空間，其性質游移於公共與私人之間，[146]在書中也獲得前所未有的突出關注，亦是由編纂者的交往脈絡向外輻射。納入在地聞人名址，同樣印證城市中文人社交活動之關懷與紀錄在志書中的突顯。

《增輯西湖合志》的編輯原則經過完整的規劃，不但仔細斟酌內容的增刪，排版也在增加可讀性的前提下重新調整。在頁面行款的規劃上，田汝成以降諸本《西湖遊覽志》多是十行二十字的設計。大幅改版的商維濬本為容納修訂後增加的字數，又不願頁數大增，於是將每頁行款改成十行二十一字。字數並不算多的此本，雖根據商本內容而來，行款卻重又改回十行二十字，閱讀時感覺較為疏朗。又如《西湖志》中各景點紀遊詩的部分，也經過重新整編及排版，原本與詩句字體相同大小的作者姓名、詩作標題，改以小

---

143 如章之采和張京元同遊瑞石山、以及和路進結伴遊徑山之事。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徑山志》，卷 12，頁 16b；卷 5，頁 14b。

144 如章之采為青龍岡題名事。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東天目志》，〈青龍岡〉，頁 23b。

145 包括章之采等人於孤山湖心亭的各自賦詩、西溪之遊「章之采同姚石嶺遊西溪次李印渚兄韻」的數人唱和、以及章氏遊徑山時懷念李印渚而作之詩。見〔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西湖志》，卷 2，頁 20a-21b；卷 10，頁 18b-19a；卷 5，頁 16a。

146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 127-186；〈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頁 1-48。前文亦論及，酒樓原本就屬公眾性，而城市中園林雖屬私人所有，此時卻常已成為眾人遊覽的名勝。

字雙行標示，有區隔段落、使層次更加分明之意。[147]

《廣西湖名山合志》分為內函和外函，內函三十九卷，〈凡例〉云：「名山五嶽為尊，首列無疑。先生之言曰，既云廣西湖志，便當自浙之山水未盡處廣之。」[148]因此前五卷始於五嶽（各佔一卷）；後二卷是楚地之玄嶽與徽之白嶽、黃山；次為卷8到34承自前書《增輯西湖合志》的內容；最後五卷則是浙江的其他名勝。外函共有十六卷，涵括南北至邊域諸名勝。[149]承繼《增輯西湖合志》範疇者有二十七卷，在全書五十五卷的帙數中約佔一半，亦即《廣西湖名山合志》在篇幅上擴充了一倍。

就內容而言，除五嶽居首外，其他地區之排列順序似沒有特殊考量。各卷內容大致分為名勝介紹加上名人題詠、遊記兩部分。《增輯西湖合志》的既有內容、以及卷首之書名，大致都被保留，只變更了各卷之景區標題與編纂者的序言，另外也增加了西湖地區遊記的篇幅，這是商本《西湖遊覽志》原本所缺者，即使與《增輯西湖合志》內容相較，遊記在數量及架構本身的可見度在本書中都被大幅提升。西湖及鄰近名山除了佔最多篇幅外，由於新增諸卷以《廣西湖名山合志》為卷首之題名，前後兩版的區隔還是很容易辨認，這當是編纂者有意識的選擇。

當範圍大幅擴充之後，對志書內容的取捨勢必得更為謹慎。該書〈凡例〉裡清楚標明其取捨原則和重點：「合志與專志不同，專欲詳，合欲該，又欲約。長篇累牘，自有專志總之。志山水期於盡山水而止。」[150]亦即先聚焦於山水之勝。題詠詩賦既多，更需篩選：「山水志便臥遊也，極天下之山水，又必極古今山水之紀述。詩賦不勝書，亦不勝讀，悉刪去，最有關山水者錄之。」[151]

廣及天下名山、加強遊記篇幅的體例，都與既有之西湖志書大不相同，

---

147 此外，如《徑山志》景點的各個條目，標題字體較粗，底下的說明文字則以較細字體刻印以作區隔，也是更利於閱讀的設計。

148 〔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凡例〉第 2 則，頁 1a。

149 全書始於三吳二卷，次乃西江二卷、楚江、大河各一卷，再及於閩、蜀、鄒魯、晉、粵、關中、雲貴，終於幽燕。

150 〔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凡例〉第 7 則，頁 1b。

151 〔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凡例〉第 6 則，頁 1b。

讓人不得不想起在晚明相當流行的名山遊記合集。文人之間的旅遊風氣既興，不但在文集中出現單篇紀遊文字，[152]更出現記述遍遊各地所見之遊記專書。從吳郡都穆（約1459-1525）撰述個人遊歷經驗之《遊名山記》，到括蒼何鐿（1507-1585）收錄古今遊記編成的《古今游名山記》（1565年初刻），再到吳興慎蒙據前書「刪繁削冗」再編選過的《刻名山諸勝一覽記》（1576），這些文本在萬曆之後均迭經刻印，崇禎間更出現了圖文並茂、版本眾多的《天下名山勝概記》（最通行者為1633年杭州墨繪齋刊本），足見此類旅遊書籍之大受歡迎。[153]西湖雖以湖景聞名，但因包括南北高峰與孤山，在這些名山遊記選集中並未缺席，顯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景區。更值得注意的是，錢謙益（1582-1664）曾說：「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154]可見晚明時杭州地區特別熱衷於刊刻名山記書籍，這或許和西湖蓬勃的旅遊業有關。兩本《西湖合志》的編纂者章之采即實際參與了墨繪齋本《天下名山勝概記》的校閱工作，[155]對於該系列書籍當不陌生，《廣西湖名山合志》的理念和架構也應是受其影響。

至於西湖與鄰近地區在天下名山間被放大的情況，也有杭州當地出版的前例——由楊爾曾編纂的《海內奇觀》（約萬曆三十八年刊），[156]該書亦可放入此系列中。名山記合集的編纂與刊印在晚明重要性漸增，內容之文本與圖像對於清代、乃至東亞其他地區影響深遠，但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礙於篇幅所限，本文也無法再多所分析比較，筆者希望日後再另以專文探析。從架構

---

[152]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系〉，《復旦學報》，2005：1（2005），頁 72-78。

[153] 關於天下名山遊記合集的初步討論，見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19（1993），頁 152-154。

[154]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越東遊草引〉，頁 928。此類書籍存世數量不少，但刊印狀況複雜，目前亦未見到深入的研究。據存世晚明刊本判斷，像刊印《天下名山勝概記》最重要的兩個版本、且明確標出書坊名稱的墨繪齋及讀書坊便都位於杭州，在杭州地區刻印的比例確實高過他地。

[155] 如墨繪齋本《天下名山勝概記》的雲南部分，第一篇〈雲南山川志〉便標明「成都楊慎撰」、「章之采閱」。見〔明〕佚名，《天下名山勝概記》（臺南：莊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卷 47，頁 347。

[156] 在十卷篇幅中，卷 3 為西湖，卷 4 為吳山、錢塘、天目山，西湖地區在全書中所佔的比重甚高。

或涵括內容初步判斷，《廣西湖名山合志》與《海內奇觀》頗為接近，[157]很可能是受其影響。在這樣的氛圍中，各自平行發展已久的西湖名勝志書，與天下名山遊記合集系列交相融匯，方刺激了《廣西湖名山合志》的誕生。

五、在地、歸人、或過客：名勝志的修撰者

回顧從嘉靖到崇禎年間的系列西湖山水志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許是刻印的頻繁。西湖志的刊本當然有許多，但西天目山從萬曆到崇禎末年有七次編纂、更新志書的紀錄，以佛教史蹟聞名之徑山，其相關志書若計入小幅改版也是六、七種。這當然是在雕印出版越來越普及的背景下方有可能，但也反映刻印者和讀者的需求。究竟是那些人在編纂與刊刻名勝志？為何而編印？欲滿足何種需要？姚孫棨的〈名山合志序〉中標舉出暫居與久留杭州者合作修纂志書的現象，以及對逸遊與臥遊之別的討論，或可幫助我們窺其端倪：

> 人亦有言，濟勝之具，最上莫如緣，其次興，又其次時。……然一時之緣較易，千古之緣尤難。何為一時？儕偶招攜，結襪攀躋，以恣逸遊者是。何為千古？聲氣應求，指點林麓，以快臥遊者是。皖之去武林二千里而遙，武林之去皖，去蒲，不啻三倍。其地天若限之矣，莫為之介，後先把臂，哦咏湖上，藉晴光烟雨，鳥啼花落中，琢句選詞，如余與印渚李年兄之于去浮，天耶？人耶？一時千古耶？余兩人偶先着鞭，去浮偃仰西湖，獨占片席，樂有餘閒。……[158]

西湖系列名勝志書的修纂人員與一般方志的情況接近，除了性質上屬於寺志的《西天目祖山志》和《徑山集》是由僧人修撰，商維濬刊本《西湖遊覽志》是坊刻書籍，大抵多是由知府、知縣等來自外地的地方各級官員擔當修志的

---

[157]《海內奇觀》始於五嶽、白嶽，西湖山水後列浙江名勝，包括閩粵川滇、太和、五臺等，均與《廣西湖名山合志》同。雖然三吳居前、未見幽燕、未突出遊記等編排和後者有些出入，架構與內容仍頗類似。該書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2編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58]〔明〕姚孫棨，〈名山合志序〉，《增輯西湖合志》與《廣西湖名山合志》之卷首均收錄此序文，頁1a-2b。

管理與審訂工作，實際編纂者則通常是地方上的退休官員、文人或諸生。[159]修纂郡邑方志本是地方官的職責，通常也由其擔當最重要的主修之職，[160]雖有例外，絕大多數應屬官方刻書。名勝志的內容與地方政務未必相關，和官方的關係便仍需依個案來斟酌。嘉靖間田汝成自官職退休後返鄉定居，帶著保存地方文獻的使命感，編撰了第一部以西湖為題的專志《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四庫總目提要》稱其「因名勝而附以事跡，……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161]書成後，他曾先後向數位在杭官員爭取支持，因被肯定「是誠郡史，可以傳矣」，才終由知府嚴寬命屬下督印完成，亦有得到其他官員捐資贊助。[162]官員助印的性質究竟屬於官刻或私刻，定義上有其模糊的空間。但〔萬曆〕《杭州府志・諸公署鏤版》是萬曆以前杭州府各機構刻書的紀錄，便列有此書，[163]雕版又存於杭州府中，[164]顯然被視為官刻書籍。後續由浙江巡按范鳴謙和杭州知府季東魯（1561-?）所重修的版本，也都是主其事者捐俸出資、命郡丞或生徒修訂而成，雖然沒有前述這樣清楚的界定，仍具有濃厚的官刻氣息。

山志不似收錄相當多杭城史料的《西湖遊覽志》與《志餘》等同於郡史，但於潛知縣徐嘉泰邀請仁和知縣喬時敏一同編纂《西天目志》，顯然認為編志是邑令之責。杭州知府孫昌裔主持新纂《三修西天目志》，命於潛知縣劉名世鳩工視成，參與校閱編次之學博、孝廉、諸生人數眾多；[165]三年後杭州

---

[159] 見 Joseph Raymond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Histories in Ming China,” 104-152;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頁 123-153。祈晨越以成化與萬曆版《杭州府志》為例所作的討論，也得到相同結論。見氏著，〈明代杭州的書籍刊刻活動〉，頁 87-93。

[160] 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18：2（2007），頁 15-19。

[161]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70，頁 618。

[162]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上海：上海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五年[1597]季東魯刻本），卷 1，〈西湖遊覽志敘〉，頁 6。

[163] 〔萬曆〕《杭州府志》，卷 53，〈藝文上〉，頁 844。據該卷記載，《西湖遊覽志》與〔成化〕《杭州府志》並列，後並附註「已〔以〕上杭州府鏤板」。

[164] 〔明〕田藝蘅，《田叔禾集》，收入〔清〕丁丙、丁申輯，《武林往哲遺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卷首，〈家大夫小集引〉，頁 4a。

[165] 〔明〕孫昌裔，《三修西天目志》，〈凡例〉第 8 到 12 則，頁 26a-b。

知府李燁然繼續纂成《東天目山志》，也是在郡丞、司理的協修之下，責成臨安知縣姚鏜來刻印成書。雖然未提及資金的來源，但既已動用如此多官方的行政資源，實已近於官刻。有趣的是，李燁然同時也支持《徑山志》的編印，負責編纂的宋奎光之前也曾經參與《三修西天目志》的校閱工作，但屬於寺志性質的該書是由李燁然「捐廉刻其板，藏之山中」，除有多卷均標示由地方文人或僧人助印，又被收錄於《徑山藏》中，性質非常特殊，而官方本不刻寺志，[166]或許更近於私刻性質。

放在這樣的脈絡中來看，李紹賢主修的兩部《西湖合志》當然純屬私人刻書，但仍顯得格外不同，因為李紹賢是隨遊宦的父親居杭，本身從未在杭州一帶任官，他在兩部志書編纂期間更早已遠調北方。既無「守土之責」，李紹賢邀請撰寫序文者較近於個人情誼所繫，主要編纂的章之采則是早年居杭時同覽湖光山色的伙伴，和過去諸本志書相較，可說是起於追憶昔時逸遊的經驗，沒有官職的包袱，用心立意亦與之前的名勝志書頗有差異。

主修者既多為過客，實際執筆的編纂者自以長住杭州、偃仰西湖邊上、熟悉地方文獻與景點的在地文人最佳。在系列西湖山水志中，尤其突出的是出現張（章）之采這樣參與多種志書的編纂者，從商本湖志、三修與四修西天目志、東天目志、乃至兩版合志，二十餘年間累積的豐富資歷，絕對已讓他成為相當專業的編纂者。這或許也導因於環西湖區域之名勝特別密集。不過我們也見到「三載西湖客」的松江人喬雲將主纂之徐嘉泰本《西天目志》、和「栖苕上三年」的常熟人宋奎光輯成之《徑山志》，[167]在協修、校閱、編訂等工作中更可見到不少外地人的參與，從志書本身似乎難辨其高下或差異。籍屬當地與否似乎並非影響編纂志書的關鍵因素，而須探究其用心立意。

從書坊雕印的各種西湖志書改編本與名山遊記版本之眾看來，在杭州刊刻的商業旅遊書籍數量絕不在少數。雖然偶爾可見到購買山志的紀錄，[168]但無論是否屬於官刻性質，山水志多半應無商業性的意圖。這些官員文人為何

[166] 官方以刻印大藏經為主。見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48。

[167] 〔明〕宋奎光輯，《徑山志》（《四庫存目》版），〈跋徑山志〉，頁 581。

[168] 如崇禎間曾有僧人購得鄧尉山聖恩寺舊本山志。見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58。

修纂名勝志？自發撰寫《西湖遊覽志》的田汝成是因「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若將他畢生著作的刊印狀況視為整體來觀察，謀求官方支持或不只為募集資金，也有欲廣其傳布以經世致用之意。[169]贊助田志的官員既認同其為「郡史」，當然是有保存文獻之心，二刻的范鳴謙也是在杭州政事稍平之後，欲覓田志以閱，發現已漫漶難讀：「湖山在目而文獻靡徵，可乎？於是捐贖鍰，檄郡丞喻均校其漫漶而屬諸剞劂，俾後之觀風者采而斟酌焉，則武林之風勿慮其終靡也。」[170]其修志動機更進一步具有風教之意。三刻全志的季東魯亦有類似心意：

> 若列眉吏茲土者，藉取之以修憲，齊民陶振，風俗何慮其難舉……郡志頃新于百年久曠之後，綜括大要，足垂明信，若其故實，纖細罔遺，則是志羽翼為多，固裒然一國之史也。……乃令生徒校而補之，捐俸再梓。噫，守吏之事，重民瀦溉，于湖重，則于志亦重，此不佞再梓意也。[171]

文中實將《西湖遊覽志》視為等同於地方志，立意亦相當嚴肅。

其他山志便難如西湖志般達成教化之目的。徐嘉泰、孫昌裔、李燁然這些地方官員屢修西天目志時，雖也有護持天目、保存地方史料之心，但隱然也有視之為個人政績之意，與修方志的普遍狀況相同。[172]不過比起編纂〔萬曆〕《杭州府志》歷經一年多才完成，[173]前後費時三個月即完成初稿的《徑山志》容易許多，還能讓李燁然自比於白、蘇。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原本即較少加入歷史文獻紀錄的山志中，不似商業旅遊指南般提供方向導引等實用資訊，而特別偏重於紀遊的詩文，當代作者的比例尤高。同題材志書在迭經刻印的過程中，史跡的描述早已固定，變

---

[169] 祈晨越，〈明代杭州的書籍刊刻活動〉，頁 112-120。

[170] 〔明〕范鳴謙，〈西湖遊覽志序〉，收入〔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冊 1（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十二年[1584]范鳴謙刻本），卷首，頁 3b。

[171] 〔明〕季東魯，〈重修西湖志跋〉，收入〔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冊 8（上海圖書館藏本），頁 2b-4a。

[172]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頁 132。

[173] 〔明〕徐栻，〈萬曆杭州府志序〉，收入〔萬曆〕《杭州府志》，頁 4：「始於萬曆丁丑（五年，1577）之夏，迄於戊寅（六年，1578）之秋殺青。」

動最明顯的往往是紀遊文學的部分，亦即文人以主觀之眼描繪所見之景、與記述個人性的交遊活動，要比客觀之自然與人文景觀的記載更為突出。清初吳秋士為名山記所下的定義恰可說明兩者之異：「名山記不比廣輿一統諸書，蓋彼貴方名古蹟，在在不遺，此則遊歷所志，境與意會，人自為文。」[174]個人留下的印記變得相對重要。

將公眾性勝景紀錄轉化為私人賞景記憶的傾向，在李紹賢與章之采修纂的兩本《西湖合志》達到高峰，尤其在《廣西湖名山合志》中，甚至與天下名山遊記集的體例結合，將地志進一步轉為紀遊之書。除了李紹賢純屬過境旅人，而非守土官吏，身分與心態不同之外，應該也與晚明興盛的旅遊風氣、以及蓬勃的旅遊書籍出版風潮有關，地志或紀遊書籍讓無法親臨其境逸遊的讀者亦可臥遊名山大川，立意已與近乎郡史的早期西湖志書相去甚遠。[175]林開世在討論官修方志的文體及內容時，曾將之與詩詞、遊記、筆記小說等文體對比，指出方志中往往盡量排除私人的聲音。[176]本文所探討的系列名勝志，卻大量納入這些文本，藉以彰顯編纂群的個人經驗與意見，這或許正是章之采強調與郡邑方志區隔的深意所在，也提醒我們地方志書形制的多元及複雜。

從地志轉向紀遊的傾向，其實不獨發生於杭州製造的西湖志書，如安徽九華山也是於風景和宗教面向同樣著稱的名勝，鄭三俊（萬曆二十六年〔1538〕進士）為池州知府顧元鏡於崇禎二年重修之《九華志》所作的序文曰：

> 徃志今已闕如。考之萬曆志屬邑令，嘉靖志屬郡侯，而郡侯亦第仰承中丞，□則未有獨抒意匠，刻畫神工，如我韻翁顧侯之新茲志矣。夫名山豈堪為俗吏知己哉？攷昔歐公在滁，寬簡致治，酣暢亭泉。蘇公在杭，救活萬家，嘯咏龍井，夫然後山川受其品題。而我侯今日之政治之興會方于二公，殆庶幾焉，則此志之為此山增價多矣。[177]

---

[174]〔清〕吳秋士，《天下名山記鈔》，冊 1（大阪：中之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凡例〉第 5 則，頁 1b-2a。

[175]《四庫全書總目》中讚揚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游記徒以觴詠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70，頁 618。

[176]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頁 12-13。

[177]〔明〕鄭三俊，〈九華志序〉，收入〔明〕顧元鏡重修，《九華志》（臺南：莊

顧元鏡序文則說自己「少負子長游覽之願，嘗欲採錄海內名山，著成一書，而力未遑也」，後成此書。[178]明末新編的名勝志縱是出自地方長官，在旅遊之趣的薰染下，悠遊與品題山水已逐漸取代政績而成為關注的重心，顯然與前代官員的立意有別。本文一開始援引之傅梅所撰《嵩書》，在天啟年間也有重編再版，新收入者幾全為當代紀遊詩文，尤以傅梅個人創作者居絕對多數，[179]似亦可看出風氣的轉變。

《西湖合志》與同時期他方名勝志書相較仍有所差異，書中的私人性記憶並非純屬個人，而是集體的回憶。相對於遊記，紀遊詩在書中的變動更多，而且隱然可看出與修纂者的人際網絡有關。前文已提及參與纂修和寫作序文者常是友朋或同僚的關係，在方志撰修中也可見到由個人網絡連結的情況，[180]亦都有「揚名於後世」的渴望，但於西湖名勝志書系列中，往往具體呈現為結伴同遊與觴詠唱和。參與多部志書修撰的章之采實是重要的核心，其交遊更具有跨越世代的傾向。[181]書中的紀遊詩，除了不同作者品題同一景點的相互唱和之外，也有部分是在共同的旅遊經驗中所作，甚至可能是在詩社有組織的旅遊活動中所催生。合志中題詠最多的李紹賢與章之采便是社友，從湖心亭到西溪等景點，兩人聯句題詠甚多，《增輯西湖合志・浙江勝跡》的卷首更見小字說明：「八月望江上觀潮，社兄李印渚在焉。胸中浩渺，觸于快覩，盡見志中。」[182]

文士旅遊的社交性在此時並非特例。費絲言已指出，晚明文人間盛行「社

嚴文化有限公司，1996），頁 249-250。

[178]〔明〕顧元鏡，《九華志》，〈重修九華山志序〉，頁 260-261。

[179]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標點本《嵩書》中，點校者於書後設置〈校點跋語〉一節，載錄天啟重編本所增補之詩文。見〔明〕傅梅撰，向東、關林點校，《嵩書》，〈校點跋語〉，頁 563-600。

[180]Joseph Raymond Dennis 分析參與〔萬曆〕《新昌縣志》纂修的地方士人，發現彼此多為血親或姻親，在志書中亦突出其家族之可見度。見 Joseph Raymond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Histories in Ming China,” 1-54.

[181]透過相關文字的比對可知，章之采是姚之蘭（萬曆四十三年任杭州知府）的門人，而姚氏之子姚孫棨與姚孫棐的序文與詩亦收錄於兩本合志中。李養質權關虎林，其子李紹賢隨之到杭，和章之采交遊，方能有日後的兩部合志。而姚孫棨與李紹賢又是同科進士。

[182]〔明〕章之采，《增輯西湖合志》，卷 13，〈浙江勝跡〉，頁 1a。

交性旅遊」（social tourism），好友結伴同遊常會彼此題詠唱和，甚至將之彙輯成書出版。朱之蕃（1546-1624）編撰之《金陵圖詠》包括金陵（即南京）四十景之勝景概說、圖像描繪和題詠詩，與《西湖合志》有諸多相近之處，紀錄集體共同回憶的性質尤其值得我們關注。[183]但該書作者乃金陵在地人，紀錄公眾性勝景以凝聚地方認同的意識突出，《西湖合志》則是隨父遊宦客居者和在地專業志書編撰者的合作，當進一步融入天下名山脈絡後，更加稀釋了在地性，與最初田汝成編纂《西湖遊覽志》時的地方意識大不相同。

無分在地、歸人或過客，紀遊唱和行之已久，更不乏組織性的文會。明人的結社雅集頗多，杭州的詩社尤眾，而且常常是在西湖畔活動。「西湖八社」的社約中甚且標明：「往南山俱湧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和《西湖遊覽志》中的旅遊路線接近；又云「凡詩命題止即景，不取遠拈」，顯然強調在同遊過程中隨景賦詩。西湖本是天下遊人最多的地點之一，外來者眾，流動性高，「西湖八社」便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閩人祝時泰游杭州時所創，這樣的風氣到天啟、崇禎年間仍方興未艾。[184]其實田汝成也曾於嘉靖十七年（1538）獨立刊刻與好友吳郡黃省曾同遊西湖的詩集《西湖遊詠》，其內容純粹為唱和之詩，和後來的《西湖遊覽志》在體制上還有所區隔，而明末的兩本《西湖合志》卻將志書與紀遊詩文融鑄於一，由此亦可看出兩個時期對志書性質定義的差異。

晚明的西湖畔吸引眾多來自天下各地之文士，在此進行環繞旅遊的頻繁社交活動，並積極將歌詠勝景之詩文結集為書籍出版。此現象固然見證了西湖旅遊的盛況，其與南京此一南方大都會出現相近的「社交性旅遊」傾向，

---

[183] 朱之蕃《金陵圖詠》（天啟三年刊本）之四十景圖詩可說是《金陵雅遊編》（1614年）的延伸，其後亦附有杜士全的唱和詩。《金陵雅遊編》本就是余孟麟（1537-1620）、焦竑（1540-1620)、顧起元（1565-1628)、與朱之蕃四個南京在地閩人同遊二十個景點，題詠唱和詩句的結集，該書與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同被收錄於天啟四年的第二版《金陵圖詠》中。參見 Si-yen Fei (費絲言),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9), 124-187. 不過，《金陵圖詠》的立意雖與《西湖合志》有相近之處，性質上並非志書；南京刻印的旅遊相關書籍，在數量上也完全無法和杭州相提並論。

[184]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20：1（2002），頁 125-126。何宗美，〈明代杭州西湖的詩社〉，《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3，頁 89-96。

也突顯出西湖旅遊文化與其他地域的差異，這或許和西湖獨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關——西湖豐富的自然及人文景觀，在天下人最欲到訪之旅遊景點中名列前茅，而與之相倚的杭州亦是交通便利、經濟繁盛的歷史名城，可以提供經營社交生活更為多元的空間，兩者相輔相成。王鴻泰曾指出，明代中期以後，商業繁榮、人口流動性高的城市成為公眾社交活動的重要場域，好遊的士人們遊歷他方，不但為遍覽山水之美，參與城市中的社交活動也是目的之一，與友交遊和遊山玩水實乃同等重要。彼此酬答唱和、以文會友是常見形式，而且往往需以城市作為據點。在緊密的社交網絡中，也常進一步以結社來凝聚文藝群體。[185]相較於南京這樣具有多元功能的大都會，經濟上依賴西湖旅遊活動的杭州更以旅遊人口的集結與流動為特色，社交活動與之緊密結合也就不讓人意外了。另一方面，五嶽名山雖皆可遊，但要群聚同好、吟詠唱和，卻還是得在交通往來要地的城市進行，這也是緊鄰杭州的西湖勝於其他名山之處。酒樓、園林等城市中的開放或半開放空間，在兩本《西湖合志》的記載中格外被強調的現象，或許也得從社交性在城市文化中突出的角度來理解。[186]

此外，西湖固然吸引了來自天下各地的遊人，杭州以外各地也紛紛複製西湖，以西湖為當地的景點命名，所以各種「西湖」確實輻射而遍及天下，這也是西湖相異於其他景點的特殊現象。章之采即引經據典，為新體制的立意提供根源：「以西湖視天下山水，天下山水無不西湖也者。蘇子瞻不云乎，到處遇西湖，先已得廣之之義矣。」[187]正因強調「到處遇西湖」，《廣西湖名山合志》外函最後收錄的是四篇記述杭州境外之西湖的文章，包括燕京、漢川、潁州及宇內四西湖，如此不但是從西湖延伸到觀天下，模擬西湖的翻版亦已遍見於天下各地，並納於此書篇幅之中。

重視品賞美景勝過紀實的心態，可能也是促使圖像在本文所述天啟之後

---

[185] 王鴻泰，〈浮遊群落——明清間士人的城市交遊活動與文藝社交圈〉，《中華文史論叢》第 96 期（2006），頁 113-158。

[186]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頁 1-48；〈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頁 127-186。

[187]〔明〕章之采，《廣西湖名山合志》，〈廣西湖合志二函條例引〉，頁 2a-b。

諸刊本中越來越突出的原因。文本內容雖延續，圖像卻是不斷翻新，插圖不但數量不少，而且品質極佳，遠勝商業性西湖志書的附圖，亦是此系列山水志的重要特色。由於圖像演變的狀況也很複雜，在此無法多加討論，希望日後能以另文詳加探究。

結論

明代的旅遊書籍種類繁多，從各種地志、路程書、名山遊記集到輿地之書，就連日用類書的地輿門都提供相關訊息，今日遺留的數量亦眾，可見有其需求。地志中之名勝志、寺志與郡邑方志的性質有所重疊，也各有其偏向。方志更關乎行政管理；寺志以宗教事務優先；名勝志雖也有文獻記錄的面向，因遊覽山水風氣之勃興，與旅遊之關係最為密切。浙江地區刊刻的這三類志書數量都最多，與杭州西湖此一全國性的重要旅遊景點當有密切關聯，同時也因為出版已經漸被認可為傳播的利器，從在地或遍歷外地後返鄉的文人、因公務而短暫居停的地方官員、遊蹤至此的外來旅人，都可能編纂志書，或成為書中詩文遊記的作者。本文追索西湖相關山水志書，發現其刊印頻繁，不斷重編再版，刊刻者以地方官員與文人居多，而且往往來自外地，僧人主導者則常偏向寺志的性質。此類文本的實際編撰者以在地文人為主，但也有客居者，其中甚至已看到連編多本的專業編者出現，志書內容亦受到修纂者的興趣和人際網絡影響。編纂的動機與重心從紀錄文史、可作治事參考、紀錄政績或成為政績，逐漸轉變為收錄更多個人性的交遊活動和題詠詩文，而且以修纂者為核心往外擴散的人際網絡，不但決定了撰寫序文與參與校閱的人選，也會影響到詩文是否會被收入，這點連詩文作者也有自覺，彼此也都欲藉書籍的刊印而留名後世。

杭州各種地志因其需求之大，吸引眾多文士投入編纂，相互援引和撰述者專業化的情況特別突出，志書的編撰及出版也成為文人除實際同遊之外，彼此交遊的管道或空間。若再將範圍擴大到地志之外，園林的遊覽及品賞也是值得關注的相近現象。山陰人祁彪佳（1602-1645）離職返鄉後，於明崇禎八年到清順治二年（1635-1645）間持續於寓山構建其個人園林，在尋訪遊歷各地

山水與園林的經驗之上，逐步發展和實踐其個人的園林美學，期間並開始將個人與訪客間題詠吟和之作彙集成書，甚至相互參閱、評點，先後累積為多種環繞遊賞寓山園居的詩文集，並以《寓山志》之名加以統整。[188]雖是以個人園林為主角，但經由人際網絡創作與收集遊賞美景的題詠唱和詩文，並不斷編修、多次出版的方式，卻也可與《西湖合志》系列的情形相呼應，可見是時代風氣使然。前文也提及《西湖合志》的新增景點中特別強調名士園居，明末之西湖名園甚夥，祁彪佳便曾拜訪西湖橫山草堂主人江邦玉，與之交流心得，[189]足見文人對於山水與園林的品賞亦有其交會之處。只是寓山雖不排除陌生遊客，[190]畢竟仍屬私人園林，從主人的角度去經營其美學世界實屬自然。[191]相較起來，西湖為天下人所共有，也是天下人熱衷造訪與遊賞之地，性質仍有差異。

由此看來，李紹賢與章之采於明末發展出的新志書體例，不但在內容上廣包西湖邊的諸名山，形式上也納入名勝志、紀遊詩、甚至天下名山遊記，將多元平行發展、在杭州刊刻亦甚眾的多種旅遊書籍混融統整，開創出全新的體制，這很可能也因章之采在二十餘年之間參與多種旅遊書籍的編纂校閱，累積豐富經驗，方能融匯多元、集其大成。書中雖然保留了名勝志的題名方式，編纂者及其友人的觀點與人際網絡卻仍相對突出，內涵上實已遠離早期具有存真與教化之意的官方地志脈絡，轉而成為充滿纂修者人際網絡共同記憶的紀遊集成，既是紀錄遊蹤，也能提供給不在場者追憶、想像或臥遊。這種遊覽後再形諸歌詠的方式，本是當時文人交遊活動的形式之一，當被收

---

188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

189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頁 6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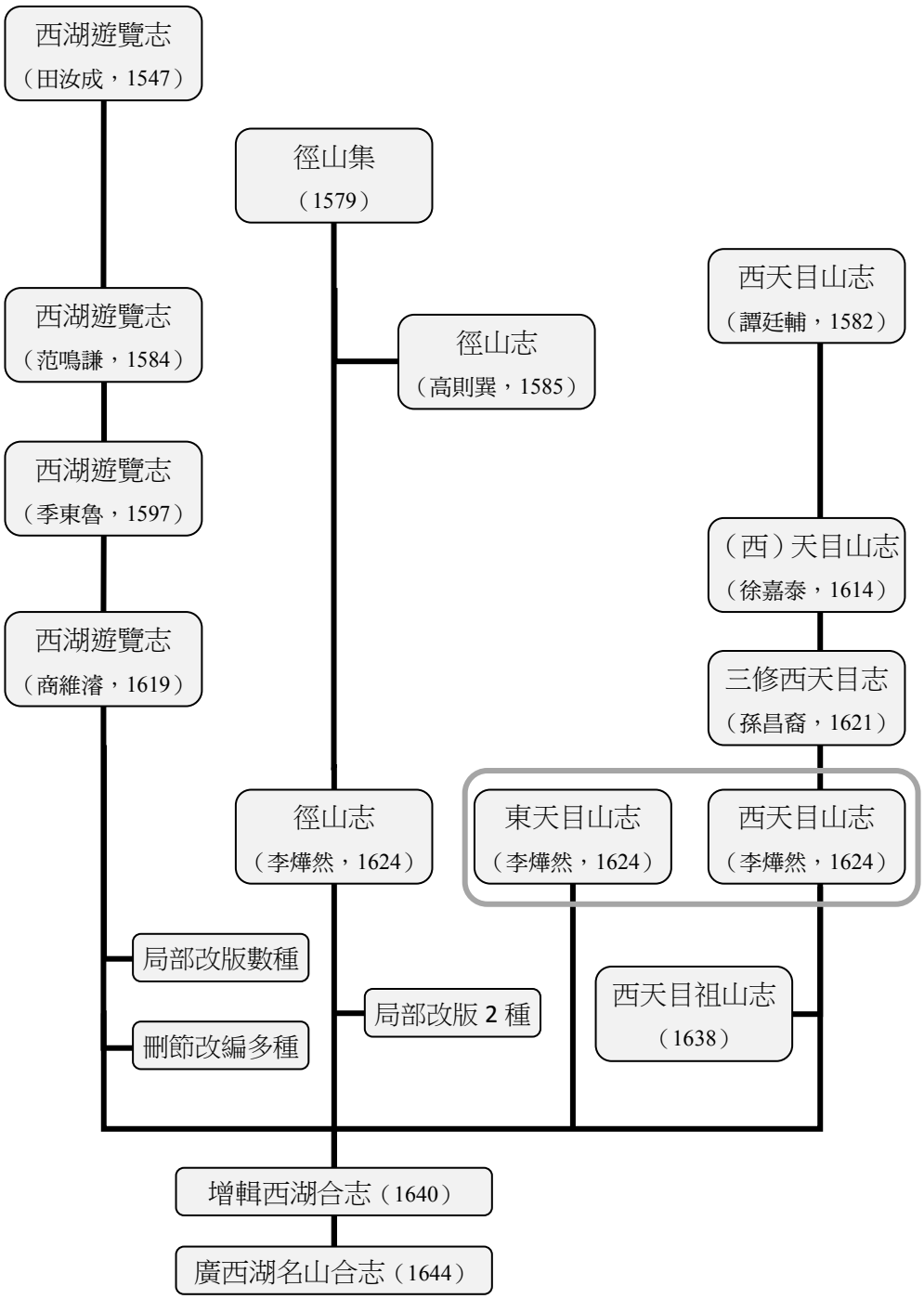
190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頁 154。巫仁恕觀察明清江南園林的發展，亦提及至少從明末開始，城市中的部分私家園林已於特定時節開放遊人進入觀賞。見氏著，《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137-191。該文主要以蘇州園林為例，然而明末西湖畔的園林，也值得關注。西湖園林不僅已在當時的志書中被視為重要景點，文士於園中遊賞之餘，習於以群體性的詩文創作活動寫景抒情，亦和山水遊賞的情況平行。但此類園林究竟向誰開放、是否有時間限制等，因篇幅所限無法深論，未來希望能進一步研究。

191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頁 164-168。

錄、編選、刊刻為書籍，更脫離時空的限制，即使未曾謀面、同遊的作者，也可以於紙上進行某種由編纂者主導的互動，私人化的名勝志書遂成為紙上文會的另類空間。《西湖合志》的出現，不但見證西湖旅遊活動之繁盛，也與城市生活的社交性息息相關，此當肇因於西湖與杭州緊鄰相繫的獨特地理位置。

本文於 2013 年 12 月 1 日收稿；2014 年 1 月 29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陳一中

附表一　西湖合志版本源流



Local Gazetteers and Travel Writing: *The Combined Gazetteers of West Lake* and Scenic Spot Gazetteers in Late Ming Hangzhou

Ma, Meng-chi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compilation of gazetteers devoted to scenic spots flourished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Writings on West Lake (西湖) were especially abundant due to its popularity among touris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editions of *The Combined Gazetteers of West Lake* (西湖合志), one published in 1640 and the other in 1644. *The Combined Gazetteers* incorporated three gazetteers—one on West Lake, the second on the neighboring mountains of Tianmu (天目山), and finally, one on the Jing mountains (徑山)—which made it unusual among gazetteer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later editions, travel writings on famous mountains around the country were also incorporated.

Gazetteers of landscapes around West Lake were reprinted relatively often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period. The compilers included local literati, officials from neighboring towns, and scholar tourists. The motivations of officials who supported publication of gazetteer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ublic service—preserving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and recording local histories, —to personal interest in recording outings and conducting poetry readings which enabled fellow literati to "travel" virtually to scenic spots through texts if they could not do so in person. Gazetteer compilers began to emphasize in reminiscing the touring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recording local history, and travel writing and recreational poetry becam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gazetteers. Gazetteers

depicted West Lake not so much as a public scenic spot but rather as the site of the private memories of tourists. The great demand for gazetteers in places like Hangzhou drew ever more literati into the business of compiling them, creating a new profession for scholars. In this way,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gazetteers created an alternate space for the literati's social activities.

Keywords: West Lake, gazetteers of scenic spots, Hangzhou, print culture, tourism